

西周都城诸问题试解

周宏伟^{1,2}

(1.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陕西西安, 710062;

2. 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提 要〕学术界关于西周都城问题的研究争议甚多。借助历史、环境和语言文字的多视角分析, 这些问题可以获得科学、合理的答案。西周时期符合当时都城标准的城邑为周、宗周、成周、镐京、郑等五地。周即岐周, 为西周王朝的首都, 最为稳定的祭祀、政治、军事中心, 拥有规模最大、名目最多的祭祀、政治、军事性设施。宗周即丰(邑), 是王朝重要的政治、祭祀、军事中心, 属于行政性陪都, 其位置在今陕西户县秦渡镇左近。成周即雒(邑), 拥有较强的政治、祭祀、军事功能, 是统治东方的基地, 亦属行政性陪都。镐(京)即豳(京), 位于辟雍湖滨, 具有居住、宴饮、渔猎、娱乐、教育及政治、祭祀等多方面功能, 为西周早期的游憩性陪都。郑(西郑)即槐里, 是穆王建立的新都, 具有居住、渔猎、游赏及一定的政治、祭祀、军事功能, 属于西周中后期的游憩性陪都, 其位置在今陕西兴平东南。所谓“京师”, 含义等同于“周师”、“王师”, 不具有都城意义。这些新认识能够解释西周都城研究过程中的不少谜团、矛盾、歧异与错误, 对于西周历史、环境研究和都城考古的推进乃至昆明池遗址公园规划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西周 镐京 宗周 郑 周 成周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14)01-0057-35

〔收稿日期〕2013-09-12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013BAJ10B08)资助。

〔作者简介〕周宏伟(1965—), 男, 历史学(历史地理学专业)博士, 现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省“三秦学者”特聘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 历史地理学专业、人文地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

提及西周王朝的都城, 众所周知的是丰(邑)、镐(京), 即通常所谓文王都丰、武王都镐的所在。翻一翻今人有关西周都城历史叙述的文献, 不管是研究者论著^①还是高等学校教材^②, 我们很容易发现, 这种认识由来已久、影响深远, 显然属于学术界的主流看法。然而, 近百余年来, 由于金文、简牍和古遗址等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公布, 研究、关注西周历史的不少学者都知道, 过去学界有关丰(邑)、镐(京)及周、宗周、成周、郑、京师等西周都城方面的很多认识, 由于相互之间往往矛盾不一, 其实可能是存在严重问题甚至错误的。也就是说, 关于西周都城的许多问题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

①如齐思和:《西周地理考》,《燕京学报》第30期, 1946年;王世民:《周都丰镐位置商榷》,《历史研究》1958年第2期;卢连成:《西周丰镐两京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4—120页;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49—55页;沈长云:《中国历史·先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8—99页。

②如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0—51页;董鉴泓主编:《中国城市建设史》(第三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概括说来, 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其一, 是西周时期都城的数量问题。学术界现在几乎一致认为, 西周的王都为丰(邑)、镐(京), 洛邑(成周)为陪都, 或称东都。也就是说, 如果视丰(邑)、镐(京)为一的话, 西周时期就是两个都城; 如果视丰(邑)、镐(京)为二的话, 西周时期就有三个都城。也有学者意见不同, 或认为“庆节国豳, 古公亶父居岐下, 王季宅程, 文王居丰, 武王都镐, 成王作洛邑, 穆王都西郊, 又居豳京, 懿王居犬邱, 至于平王东居洛邑……都邑计十余迁”^①; 或认为周都有不窟故城、豳邑、岐邑、丰邑和镐京等五个^②; 或认为周都实际上有京(岐周)、丰镐和洛邑三个^③。于是, 西周时期都城的认定标准明显就成了问题。其二, 是丰(邑)、镐(京)与豳京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 豳(京)是发现于金文中的一个地名。就是这样一个金文中的多见地名, 自清末以来的百多年里, 带给了古史学者们无尽的苦恼: 豳京是镐(京), 还是丰(邑), 或是其他什么地方? 至今莫衷一是^④。其三, 是丰、镐(京)与宗周的关系问题。宗周即镐京, 这是汉代、三国时期就开始流传的看法^⑤, 一直到今天, 这个看法仍为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然而, 让人困惑的是, 在金文中却有宗周、豳京并举的情况(参见后): 如果像大部分学者所认定的那样, 豳京是镐京, 那么宗周自然就不可能是镐京。于是, 宗周到底是不是镐京, 几十年来争执不休, 让人无可适从。其四, 是周的性质与位置问题。东汉以降的古代学者多认为周即镐京或成周^⑥; 近百余年来, 由于大量金文的发现, 学者们对于周的看法产生分歧: 有的坚持周是宗周^⑦, 有的坚持周是成周^⑧, 更多的学者认为周即岐周(邑)^⑨——或以岐周为先(早)周都城^⑩, 或以岐周为西周时期的都城^⑪; 也有学者认为周的指代并不一定, 有时指岐周(邑), 有时指宗周(镐京), 有时指成周王城^⑫。周到底何指? 近两千年来似仍无确论。其五, 是丰(邑)、镐京的位置问题。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 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 周都丰(邑)的位置被确定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沣河西岸的马王村、客省庄等地一带, 镐(京)被确定在沣河以东的洛水村、上泉北村、普渡村、花园村、斗

门镇一带^⑬, 主要依据是该区域周文化遗存分布密集, 文化堆积丰厚, 且二区遗址与文献记载的

①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 氏著《古代神话与民族》,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年, 第23页。

②胡谦盈:《三代都址考古纪实——丰、镐周都的发掘与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 第9页。

③许倬云:《西周史》,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年, 第90页。

④黄盛璋:《关于金文中“豳京(豳)、蒿、丰、酆”问题辨正》, 《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4期; 王玉哲:《西周豳京地望的再探讨》, 《历史研究》1994年1期; 王辉:《金文“豳京”即秦之“阿房”说》,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三辑),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6年, 第11—16, 144页。

⑤《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 第714页毛传, 第252、731页郑笺。如第252页郑笺曰:“宗周, 镐京也, 谓之西周。”三国皇甫谧《帝王世纪》(《丛书集成》,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年)有云:“武王自丰居镐, 诸侯宗之, 谓是宗周。”

⑥东汉马融(《史记》卷33《鲁周公世家》裴骃“集解”引, 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 第1519页)、唐张守节(《史记》卷4《周本纪》“正义”, 第129页)持镐京说; 唐孔颖达(《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 第414页)持成周说。

⑦吴其昌:《矢彝考释》(《燕京学报》第9期, 1930年), 其“宗周”指镐京; 曹玮:《也论金文中的“周”》(《考古学研究(五)》,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2年), 其“宗周”指丰。

⑧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 东京:文求堂书店, 1936年, 第16页。

⑨《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2年, 第157页。

⑩陈全方:《早周都城岐邑初探》, 《文物》1979年第10期; 陈全方、陈敏:《周原》,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7年, 第13页。

⑪尹盛平:《试论金文中的“周”》, 《考古与文物丛刊》(三), 《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 1983年; 宗德生:《试论西周金文中的“周”》, 《南开学报》1985年第2期。

⑫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 北京:中华书局, 2004年, 第366—368, 405页。

⑬徐锡台:《论周都镐京的位置》, 《陕西师大学报》1982年3期。另外, 石璋如曾认为镐京在北丰镐村西北(《传说中国都的实地考察》,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下册, 1949年); 黄盛璋的看法近同, 认为在南丰镐村一带(《周都丰镐与金文中的豳京》, 《历史研究》1956年10期), 等等。

丰、镐相对位置大致符合。于是，学术界普遍认为，丰、镐“两京相距，近在咫尺（仅五华里之遥），仅以沣水相隔，名虽不同，实为一京的两部分。”^①然而，让学者们十分迷惑的是，沣西马王村、客省庄的大型夯土基址，沣东普渡村、花园村的宫室遗址群^②却与同时期的墓葬区^③紧密相邻——这样的建筑布局景观好像与丰邑、镐京作为西周都城的身份很不协调，与后来《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谓“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的周代王都模式更是格格不入。这又让人不得不对沣东遗址是不是镐京，沣西遗址是不是丰（邑）产生严重的怀疑。其六，是郑的性质与位置问题。郑（西郑）是西周时期的重要都城，在《竹书纪年》中有明确记载，少数学者也给予肯定，但绝大部分学者仍持怀疑态度。至于郑的位置，或云在关中东部，或云在关中西部，更有说在河南叶县的，迄今无法定论^④。其七，是槐里（犬丘）的性质与位置问题。传统一直认为槐里（犬丘）是周懿王所都^⑤，但今主流学界好像对此问题极少关注。槐里（犬丘）到底是不是西周都城？具体位置何在？一直没有明确结论。

应该说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使我们对西周的都城历史不能有正确的理解，对发现的可能与西周都城有关的遗址不能有正确的判断，甚至，对未来有关西周都城的考古工作和昆明池遗址公园建设工作也可能会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这些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笔者以为主要的原因可能有四：一是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有限，而过去的某些误解还使我们对有关历史文献（如今本《竹书纪年》^⑥）的重要价值长期忽视；二是近几十年来公布的大量金文、简牍、考古报告虽然丰富了研究材料，但对这些新材料进行科学释读并不容易，使得一些重要的问题长期难有共识；三是问题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矛盾丛生，单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即使正确也往往难以得到认可，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更是困难；四是对西周时代都城的认定一直没有明确的标准，使得西周时期都城研究的最基本方面也没有达成一致。显然，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要解决与西周都城相关的一系列复杂问题，没有科学、合理的研究视角是不可能

完成的。那么，什么是科学、合理的研究视角？就上述问题来说，笔者主要依靠历史、环境和语言文字的综合视角，就有可能找到较好的解决途径与方法。所谓历史视角，是指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上古时代的都城问题。都城既是一个当代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当代意义上的都城，众所周知是一国的最高行政机关所在地。但是，西周时期的都城，其内涵却与今天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例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云：“凡邑

①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镐京西周宫室》，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77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79—1981年长安沣西、沣东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3期；《陕西长安沣西客省庄西周夯土基址发掘报告》，《考古》1987年第8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镐京西周宫室》，第3—7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长安张家坡西周井叔墓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1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周镐京附近部分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84年长安普渡村西周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9期，等等。

④传统说法认为郑在关中东部的古郑县，即今华县；唐兰首倡郑在关中西部的今扶风、宝鸡一带说（见《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文物》1976年5期）；裘锡圭提出郑在今河南叶县说（见《说铎簋的两个地名——棫林和胡》，《古文字论集（一）》，《考古与文物》编辑部，1983年）。

⑤《水经注》卷19《渭水》。

⑥清中期以来，今本《竹书纪年》一直被主流学界认为是伪书。近三十年来，数有学者论定今本《竹书纪年》的内容其实是基本可信的，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参见陈力：《今本〈竹书纪年〉研究》，《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8辑，1985年，第4—15页；Edward L. Shaughnessy（夏含夷）：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Bamboo Annals（《论〈竹书纪年〉的真实性》），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6（1），1986；[美]夏含夷：《也谈武王的卒年——兼论〈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载《文史》第29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杨朝明：《〈今本竹书纪年〉并非伪书说》，《齐鲁学刊》1997年第6期；张富祥：《今本〈竹书纪年〉纂辑考》，《文史哲》2007年第2期。下述本文的一些论述也能够证实今本《竹书纪年》的内容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本文所引今本《竹书纪年》采用南朝沈约注《竹书纪年》（《万有文库》（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古本《竹书纪年》采用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下引《竹书纪年》一般只别今本、古本，不另注。

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说文·邑部》亦云：“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也就是说，先秦时代建有先君宗庙的城邑就可谓之都。我们如果能够从有关西周的史料中找出某地拥有周王先君宗庙，那么，即可以认定该地为西周时期的都城。显然，先君宗庙可视为西周都城的标志物，是否有先君宗庙，应当成为我们判断西周时期都城的唯一标准。所谓环境视角，是指要特别注意都城及其附近的自然与人文环境面貌。例如，依据金文的记载（参见后），𡩺（京）附近是有一个可以进行渔猎活动的“大池”的。显然，我们如果能够确定这个大池的性质及具体位置，对于镐（京）、𡩺（京）是否一地就可以提供强有力的自然环境证据。又如，同样依据金文的记载（参见后），周、成周、宗周等地除了太庙以外，还有一些不同名目的建筑物，通过比较各地建筑物的情况，我们应该就可以判定周与成周、宗周是否一地。所谓语言文字视角，是指要科学认识上古时代文献记录的语言文字特征。上古时代的文献，不管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涉及有关自然、人文事物的名称记载时，由于文化传播的地域障碍、时间差异和文化传播者的知识局限，大都不可能存在十分规范、统一的语言文字表达方式，因而，在解读上古文献时，我们必须要考虑历史方言、通假字、异体字等语言文字问题所产生的影响。

基于上述思考，笔者不揣浅陋，希望能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解决上述与西周都城相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下文主要围绕丰、镐、郑、周四者来进行讨论。文中或有不当之处，谨请方家不吝指正！

一 镐（京）与𡩺（京）

要证明古文献中记载的某地与某地是否一地，最好的办法应是抓住二地的标志性特征进行比较。因此，我们不妨对“镐（京）”和“𡩺（京）”二者的情况分别进行考察。

先看看关于镐（京）的相关记载。

关于“镐京”的记载并不多，皆来自于传世文献。通过分析相关文献，我们大体可以知道镐京的主要地理特征与城邑功能。其一，“辟雍”

本是镐京的标志性水体。《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即有“镐京辟雍”一句（引文见后），可见镐京、辟雍关系密切。之所以说辟雍本是水体，是因为辟雍也可以叫“辟池”，辟池之“池”即与辟雍之“雍”同义。《史记·封禅书》说：“泮宫有昭明天子辟池。”唐司马贞注云：“顾氏以为……今所谓天子辟池，即周天子辟雍之地。张衡亦以辟池为〔辟〕雍。”^①其实，此前千多年的《诗经·周颂·振鹭》中即云：“振鹭于飞，于彼西雝”，《毛传》：“雝，泽也。”^②这里的雝即同雍^③，也就是湖泽的意思。那么，作为水体的西周镐京辟雍，其具体位置何在？今本《三辅黄图》说辟雍“在长安西北四十里”^④，显为唐人口气，自不可凭信。不过，由于辟雍是与镐京相联系的，只要知道了镐京的位置，辟雍的位置应就可以确定。《史记·周本纪》“集解”引晋徐广有曰：“镐在上林（苑）昆明（池）北，有镐池。”酈道元说得更清楚：“（昆明）池水北径酈京东，秦阿房宫西。”^⑤众所周知，镐、镐京、酈京为一地，而根据近年的考古探测，汉唐昆明池遗址的准确位置被确定在今西安市西长安区斗门镇、细柳镇一带^⑥（参见图1^⑦），因而，镐

①《史记》卷28《封禅书》“索隐”。所谓“顾氏”当指南朝顾野王（519—581年），《玉篇》撰者。

②《毛诗正义》卷19之3《周颂·振鹭》，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766页。

③如《尔雅·释地》“河西曰雝州”之雝州，《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中均作“雍州”。见《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21页；《周礼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190页。

④陈直校证：《三辅黄图》，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1页。

⑤《水经注》卷19《渭水》。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唐昆明池遗址的钻探与试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10期。

⑦本图水系参据下列诸文绘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唐昆明池遗址的钻探与试掘简报》；李令福：《从汉唐渭河三桥的位置来看西安附近渭河的侧蚀》，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增刊），第60—83页；吕卓民：《西安城南交漓二水的历史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考古队：《1961—62年陕西长安沣东试掘简报》，《考古》1963年8期。

（京）应在此昆明池遗址之北、镐池（昆明池水北流通道）遗址之西无疑。今昆明池遗址之北、镐池遗址之西区域是长安区洛水村、上泉北村一带。据报道，这一带存在着大量的西周文化堆积，发现有大量的西周瓦和涂抹有“白灰面”的草泥土，研究者因此认为这里当属于西周权贵人物的生活场所^①。笔者以为，准确地说，这里应该就是西周镐京遗址的所在（参见图1）。而镐京遗址一带除了昆明池外，没有更大的湖泊水体，昆明池的前身应当就是周代的辟雍。

然而，按汉《白虎通·辟雍》的说法：“辟者，璧也，象璧圆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② 汉毛亨亦说：“水旋丘如璧曰辟雍。”^③ 今天发现的汉代辟雍遗址也确实是圆的^④。如果昆明池的前身是周辟雍，自然就不可能是圆形，这该如何解释？其实，说辟（璧）雍“象璧圆”是汉已降人们的错误理解，因为辟、璧二字仅是同音通假，辟（璧）雍的本来含义是指位于“辟”地的一片较大的积水区，与玉璧、圆形完全无关。也就是说，辟是一个地名。对此，现在从出土铭文《麦方尊》（参见后）中有“王令辟井侯”一句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因为，所谓“辟井侯”，与金文中的“郑井叔”、“丰井叔”之类称呼、传世文献中的“鲁周公”、“燕召公”之类称呼显然属于同样的构词方式，郑、井，丰、井，鲁、周，燕、召既皆是地名，辟、井毫无疑问也当是地名。正由于辟、井皆是地名，所以，《麦方尊》中辟井侯才又可略称为“辟侯”、“井侯”。顺便说，“辟”为地名认识的取得，可以使早期传世文献中“辟王”、“辟公”的含义谜题迎刃而解。《诗经·大雅·棫朴》有云：“济济辟王，左右趣之。济济辟王，左右奉璋。”郑玄笺曰：“辟，君也。君王谓文王也。”^⑤ 《诗经·周颂·载见》有云：“载见辟王，曰求厥章。……烈文辟公，绥以多福，俾缉熙于纯嘏。”郑玄笺曰：“诸侯始见君王，谓见成王也。……成王乃光文百辟与诸侯，安之以多福，使光明于大嘏”^⑥。《诗经·周颂·烈文》亦云：“烈文辟公，锡兹祉福。”郑玄笺曰：“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诸侯者，天赐之以此福祉也。”^⑦ 朱熹《集传》因此曰：“辟公，诸侯也。”^⑧ 也就是说，传统上是把“辟王”等同于君王、“辟公”等同于诸侯

的。这样的看法，尽管是近两千年来为历代学者所一致认可的解释，但其中存在的矛盾、难解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我们如果视辟公为诸侯，就会与《荀子·王制》中提到的“辟公”职责为辅助周王治理天下风俗的内容发生矛盾。《荀子·王制》如是云：

本政教，正法则，兼听而时稽之，度其功劳，论其庆赏，以时慎修，使百吏免尽而众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兼覆而调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纂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乱，则冢宰之罪也；国家失俗，则辟公之过也；天下不一，诸侯俗反，则天王非其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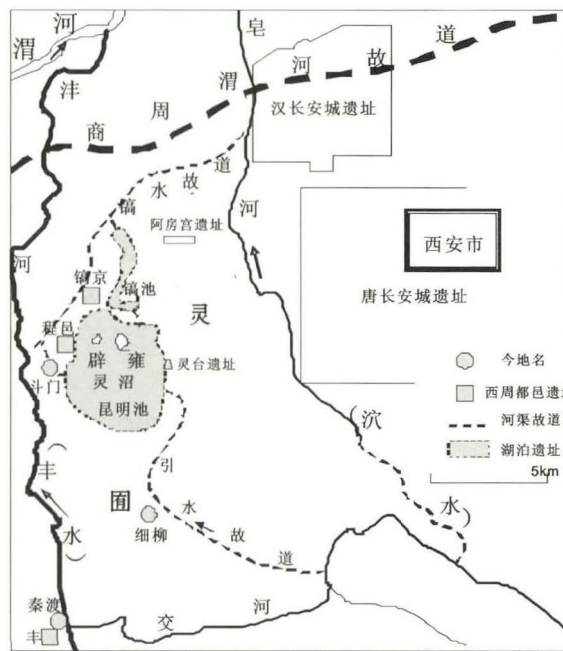


图1 西周镐京辟雍附近复原示意图

然而，我们如果视“辟”为地名，那么，辟王、辟公的解释就变得十分简单：第一，辟王即

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考古队：《1961—62年陕西长安沣东试掘简报》。

②《白虎通》卷2下，北京：中华书局，第131页。

③《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1043页。

④陈直校证：《三辅黄图校证》，第112页。

⑤《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996页。

⑥《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1338—1339页。

⑦《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1290页。

⑧朱熹：《诗经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3页。

长住辟地的某个周王，就像《诗·大雅·韩奕》“韩侯取妻，汾王之甥”句中的“汾王”指周厉王^①、西周早期器物铭文“周王”、“丰王”指周文王^②一样。由于众所周知周武王宅镐（参见后），辟雍即在镐京附近，或者说镐京属于辟地，故知文献中所谓辟王当特指周武王，而并非君王泛称。西周晚期器《伯公父簋》铭文中的“辟王”^③即其例，而后录《望簋》铭文“死司毕王家”句中的“毕王”，则为辟王之异写。（参见后）第二，辟公为辅佐周王治理天下的重要爵位，与西周初年著名的“周公”、“召公”类似。我们知道，周公为周文王子，因其采邑在周（即岐周。参见后）而称周公，周公曾以冢宰之职摄政辅佐周成王；召公亦为周文王子^④，因其采邑在召（今陕西岐山西南）而称召公（异作“邵公”），召公曾以太保之职摄政辅佐周成王。同样，毕公也是周文王子，当因其采邑为毕而称毕公。在西周历史上，毕公主要是以辅佐周康王而知名。由于毕、辟二字上古音近同（参见后），故毕公在金文、传世文献中也写作“辟公”。如西周早期器《保员簋》有云：“唯王既燎，厥伐东夷，在十又一月，公返自周。己卯，公在虢，保员迺，辟公赐保员金车，曰：用事。”^⑤该铭文中的“辟公”即当指毕公。《尚书·周书·毕命》以“王曰”的形式表述了毕公的职责：

王曰：“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我闻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以荡陵德，实悖天道。敝化奢丽，万世同流。兹殷庶士，席宠惟旧，怙侈灭义，服美于人。骄淫矜侔，将由恶终。虽收放心，闲之惟艰。资富能训，惟以永年。惟德惟义，时乃大训。不由古训，于何其训？”

显然，毕公的主要任务在于“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恶，树之风声”等^⑥，与上录《荀子·王制》所谓“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兼覆而调一之，辟公之事也”完全一致。这进一步证实辟公、毕公确为一人而异写。

• 62 •

其二，镐京（辟雍）是显示周王权威、教育贵族子弟的地方。对此，《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有明确的描述：

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诗中的“皇王”、“武王”，分别指的周文王、周武王父子。所谓“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的意思，郑笺的说法是：“周武王于镐京行辟雍之礼，自四方来观者，皆感化其德，心无不服者”^⑦。这也是近二千年来古今学者一致认可的说法。但是，对照前文关于辟雍为水体的论证、皇王指周文王的共识，我们就会发现，郑玄这样的解释是无比错乱的。其实，诗中关键的“无思不服”四字，当不是“无不归

①《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1234页）郑玄笺云：“汾王，厉王也。厉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时人因以号之。”

②康王时器《小孟鼎》铭文之“周王”指周文王无疑，这是因为文王先居周（岐周）地的缘故；指为西周早期铜器的《丰王斧》（11774—9）、《丰王铜泡》（11848—5、11849—5、11850—6）铭文皆有“丰王”二字，丰王亦当指文王，因为文王在灭崇（程）后徙居丰（参见后）。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6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第417、695、716—718页。

③《伯公父簋》铭文如下：“伯太师小子伯公父作簋，择之金，唯铕唯卢，其金孔吉，亦玄亦黄，用盛糲、稻、糯、粱。我用召卿（飧）事辟王，用召诸考诸兄，用祈眉寿，多福无疆！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参见周原考古队：《周原出土伯公父簋》，《文物》1982年第6期）所谓“卿（飧）事辟王”，即指用来祭祀先祖开国之君周武王。伯公父器与伯多父（即郑桓公。参后文）器同出陕西扶风云塘村一铜器窖藏，疑公父、多父为兄弟，皆周宣王子。

④召公是否为文王子尚有争议，今从主流说法。

⑤张光裕：《新见保员簋铭试释》，《考古》1991年第7期。

⑥《史记·周本纪》云：武王“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间。”这是说，周武王命令毕公释放前朝囚禁的百姓，旌表前朝贤士商容的家乡。可见，《毕命》虽可能为晋人伪作，但其所述内容并非没有依据。

⑦《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1053页。

服”的意思。思，可能不是传统所认为的语助词，而当与“司”通假，为主管的意思。郑玄本人释《周礼·地官·司市》“思次”二字时即云：“思当为司字。”^①而服，《说文·舟部》云：“用也。……从舟，𠂔声。𠂔，古文服，从人。”也就是说，服的本义应该与人使用舟船有关。“镐京辟雍”句的意思大概就是说：镐京辟雍，无论是东岸、西岸，还是南岸、北岸，没有文王的许可人们是不能够下水用船娱乐的。从图1可以看出，辟雍的形状接近四边形，确实是有东、西、南、北四岸的。所谓“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是说周文王作出在镐京建设居所的决定，周武王圆满完成了建设任务。（参见后）所谓“诒厥孙谋，以燕翼子”，则是指辟雍也是培训周朝统治者子孙后代的地方。

其三，镐京（辟雍）是周王居住、饮酒、渔猎和娱乐的地方。先看《诗经·小雅·鱼藻》：

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

鱼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镐，饮酒乐岂。

鱼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镐，有那其居。

诗中的“镐”，当然就是镐京。所谓“王在在镐，有那其居”，是说周王在镐京拥有安逸的住所；所谓“王在在镐，岂乐饮酒”、“王在在镐，饮酒乐岂”，则是说周王在镐京饮酒、娱乐。再看《诗经·大雅·灵台》：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

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於物鱼跃。

虞业维枏，贲鼓维镛。於论鼓钟，於乐辟雍。

於论鼓钟，於乐辟雍。鼙鼓逢逢，蒙瞍奏公。

该诗一般认为是诗作者借百姓为周文王建造灵台的故事来歌颂文王有德，人民乐于归附，反映了周文王在灵囿狩猎、在灵沼捕鱼、在辟雍娱乐的情形。灵台、灵囿、灵沼，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在丰邑附近。其实，从此《灵台》诗的内容并结合相关记载来看，周初作为水体的辟雍应该与

灵台、灵囿二者相近相邻，而灵沼其实就是辟雍水位降低后分割出来的周边小水体，或辟雍的子遗。为什么这么说？

先说灵沼。《三辅黄图》有云：“周文王灵沼，在长安西三十里。……《三秦记》曰：‘昆明池中有灵沼，名神池，云尧时治水，当停船于此池。’”^②我们知道，昆明池乃是汉武帝元狩三年发谪吏所“穿”，目的是为了讨伐滇池所在的“昆明国”而训练水军。^③由《三秦记》可知，汉武帝穿昆明池之前这里已经有水体，即所谓“灵沼”。灵沼所在地的水体面积原本应当不小，但自殷末以至汉代，可能受气候冷干（参见后）、泥沙淤浅、渗水（黄土的蓄水性不好）的长期影响，绝大部分时间水体面积已不是很广，故称“沼”。《说文》：“沼，小池也。”《左氏》有云：“雍之灵沼谓之辟雍”^④，这应是说殷末周文王时周人把淤浅趋干的“灵沼”壅水后称为“辟雍”。（参见后）汉初的灵沼，显然也是由很多小片水体构成的类似沼泽的低洼地带。汉武帝时要在长安附近找一片大面积的水体来训练水军，自然会想到利用这片低洼地带蓄水，因为土方工程量较小。所谓“穿”昆明池，当不是今天绝大部分学者所理解的在平地新开凿出一个昆明池，而当是指模仿周人把灵沼所在的这片洼地疏浚、注水后形成的巨大水体称为昆明池。《说文》：“穿，通也。”大约正是因为此，《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里换了一种说法，叫“大修昆明池”。胡谦盈曾根据昆明池遗址的地质钻探情况认为，汉昆明池原来是一个面积广大的十分古老的天然湖泊，文献记载所谓汉武帝“穿昆明池”，是对

①《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第370页。

②陈直校证：《三辅黄图校证》，第92、96页。按：陈直认为《三辅黄图》原书大约成书于汉末，今本为唐人补缀，甚为精当。可补证者为各古迹与“长安”的距离，如此谓“灵沼在长安西三十里”之类，皆是以唐长安（县）为中心；如果是汉长安，则当在其西南（参见附图1）。按1唐小里约等于443米，则灵沼在唐长安之西约13千米。这与自唐长安县治所在地（今西安市徐家庄）至昆明池遗址中部的距离略合。

③《史记·西南夷传》；《汉书·武帝纪》。

④王应麟：《玉海》卷162《宫室·庭台》，“周灵台”条引《左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2980页。

自然湖泊进行整治以及在其附近地区建筑离宫别馆，而不是在当时的地面上向下挖掘出一个“周回四十里”的人工湖^①。这个看法大体是正确的。胡氏所谓古老的天然湖泊当然也就是“辟雍”，或金文中提到的“璧雍”、“大池”、“密永”等（参见后）。顺便说，自酈道元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镐京遗址之所以大部分不见，是因为汉代开凿昆明池而被破坏^②，这样的说法显然是缺乏可靠依据的。

次说灵台。据汉初《毛诗序》所言：“灵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人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稍后刘向《新序》则云：

周文王作灵台及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闻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无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闻之，皆曰：“文王贤矣，泽及枯骨，又况于人乎？”或得宝以危国，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归心焉。^③

《诗经·灵台》的内容及其后来学人所谓“文王受命，而人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文王贤矣，泽及枯骨，又况于人乎”之类的解说，主旨是讲百姓对一个传说中的好帝王的赞美与期望，但其中的“周文王作灵台及为池沼”一句，却道出了灵台的位置是与辟池（即辟雍，见后）或灵沼的位置相联系的。灵台可能是利用疏浚灵沼时取出的土方在附近堆筑而成，所以才能“不日成之”。^④ 灵台的功能何在？《孟子》有云：“文王以民力为台、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⑤ 这就明确指出了灵台、灵沼所具有的娱乐功能。据《三辅黄图》所载：周灵台“高二丈，周回四百二十步”。^⑥ 这是说周灵台的高度大约当今46米，台基周长大约当今582米。由如此之高的高度和如此宽阔的台基，可推知灵台台基之上必然是夯土多层楼阁建筑物^⑦。西安附近的关中平原地区地面较平坦，登上高高矗立的灵台可以有较广远的视野，这就决定灵台必然会成为游赏的佳处。灵台之名在春秋时期似仍然存在，如《左传·僖公十五年》有载，秦穆公（前659年—前621年在

位）之妻穆姬就曾把俘来秦国的晋侯软禁在灵台。到战国时代，灵台之名已不见记载，取而代之的好像是“章台”。《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初并天下时，谓“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秦的章台可能是由灵台改名而来，因为，《三辅黄图》所述诸台，除“周灵台”以外，其他皆为汉代兴建，并无秦代建台的记载。战国时期南方楚王建立的数处章华台，可能也是模仿灵台的产物。进入汉代，章台之名又消失了，出现在史籍中的是“豫章台”。《三辅故事》有曰：“（昆明）池中有豫章台……；一说甘泉宫南有昆明池，池中有灵波殿。……池中有龙首船，常令宫女泛舟池中，张凤盖，建华旗，作棹歌，杂以鼓吹，帝御豫章观临观焉。”^⑧ 班固《西都赋》亦云：“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⑨ 可见汉代的豫章台（豫章观、灵波殿、昆明观）或在昆明池中，或在昆明池边。《尔雅》：“豫，乐也。”《周礼·考工记·画绩》云：“赤与白谓之章。”^⑩ 豫章一名的含义，大约就反映了豫章台

①胡谦盈：《汉昆明池及其有关遗存踏察记》“补记”，见《胡谦盈周文化考古研究选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2页。

②《水经注》卷19《渭水》有云：“自汉武帝穿昆明池于是地（指镐京），基构沦墟，今无可究。”

③刘向撰、赵仲邑注：《新序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47页。

④《史记·封禅书》“索隐”引顾氏有曰：“既立灵台，则亦有辟雍耳。”也证实了灵台与辟雍的依附关系。

⑤焦循撰：《孟子正义》卷2《梁惠王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7页。按：东汉郑玄云：“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祲象、察气之妖祥也。”（《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1038页）当是指汉时灵台的功能。

⑥王应麟：《玉海》卷162《宫室·庭台》“周灵台”条引《黄图》，第2980页。今本《三辅黄图》作“周灵台，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陈直校证：《三辅黄图校证》，第105页），有脱讹，不取。

⑦按：先秦时代台榭建筑的基本技术特点是夯土为层台，逐层内缩，各层背依台壁绕台建屋，顶上建主体建筑，形成外观似为多层的大建筑群。这样，台基面积越大，台上建筑可以越高。参见傅熹年：《战国铜器上的建筑图像研究》，收氏著《中国古代建筑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1—94页。

⑧陈直校证：《三辅黄图校证》，第94页。

⑨《文选》卷1《赋·班孟坚两都赋二首》。

⑩《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15页。

的娱乐功能和台上建筑物的红白色彩。如前所述,昆明池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细柳镇一带,而经过近年考古工作者的勘测,昆明池的遗址范围也已基本明确,但是,对于豫章台的所在并没有能够确定^①,尽管此前已有学者指出昆明池东的建筑基址即为豫章台遗址^②。笔者以为,说昆明池东的建筑基址(即后来的三号建筑基址)为汉代的豫章台是正确的。试看上述昆明池遗址钻探与试掘简报对三号建筑基址情况的描述:

三号建筑遗址位于万村西北约760米处的东岸上,南距万村西侧进水渠口约850米。现存遗址平面呈曲尺形,东西80、南北75米,是一处东面连岸,其他三面环水的台榭类建筑遗址。遗址现为一片高地,最高处高出周围地面约2.5米。从遗址断面观察,这里的地层堆积可分三层。耕土层下即为夯土台基,台基又分上下两层:上层夯土厚约1.5米,夯层清晰,每层厚约8厘米,内含大量西汉板瓦及筒瓦残片;下层夯土在现地面以上厚约1米,灰土筑成,土质紧密,夯层不清晰,夯土中夹杂较多夹砂陶片。陶器多为西周时期的器物残片,如残鬲足,夹砂红陶,袋足。表面饰绳纹。残高9、壁厚0.8厘米。由此分析,下层夯土在修筑时破坏了西周时期的文化堆积,可能是汉代昆明池东岸上建筑的基址;上层夯土中夹杂较多的西汉瓦片,说明在修筑时破坏了原来的西汉建筑遗址,其时代在西汉以后,应是后来(可能是唐代)重修池岸的遗存。

由此可知,三号建筑遗址位于昆明池边,三面环水,早在西周时代已经被利用,这与上述汉豫章台的演变历史和相关记载颇为符合,也与《三辅故事》“周作灵台,在丰水东”、《水经注》佚文“自丰水北迳灵台西,文王又引水为辟雍灵沼”^③的说法完全一致。可见,汉豫章台的前身当即周灵台(参见图1)。《左氏》有谓“天子灵台,在太庙之中”^④,应是说的东周春秋时洛邑王城灵台的情形。今本《三辅黄图》所谓“周文王灵台,在长安西北四十里”文字当为唐人所补,并不可信。

三说灵囿。据《三辅黄图》卷4“苑囿”所

记,周灵囿的情况大体如下:

周灵囿,文王囿也。《诗》曰:“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鹄鹄。”毛苌注云:“囿,所以域养禽兽也,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灵者,言文王之有灵德也。灵囿,言道行苑囿也。”《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刳茅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其利也。”^⑤

显然,灵囿的主要功能是圈养禽兽,有些类似于今天的一个大型野生动物园:周代“方七十里”,约当今29公里,面积不可谓小。后来的上林苑应该是在灵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上林苑”的名字可能就来自于“灵囿”所改。灵,上古来母耕部,可拟 lieŋ¹;林,上古来母侵部,可拟 liəm¹,^⑥二字读音近同,而苑、囿同义。《史记·秦始皇本纪》在秦始皇二十五年初并天下时已提及位于渭水南面的“上林(苑)”,到10年后的三十五年,“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⑦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唐昆明池遗址的钻探与试掘简报》。

②胡谦盈:《汉昆明池及其有关遗存踏察记》。

③王应麟:《玉海》卷162《宫室·庭台》,“周灵台”条引,第2981页。

④王应麟:《玉海》卷162《宫室·庭台》,“周灵台”条引《左氏》,第2980页。

⑤陈直校证:《三辅黄图校证》,第83页。

⑥李珍华、周长楫编撰:《汉字古今音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64、427页。

⑦《三辅黄图》有云:“阿房宫,亦曰阿城,(秦)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始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表南山之颠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陈直校证:《三辅黄图校证》,第14页)所记与之有不同。按:此之“规恢三百余里……辇道相属”一句当为错简,宜删。因为,对照下录《三辅黄图》所言汉上林苑“周袤三百里”、“方三百四十里”、“方三百里”诸说,“规恢三百余里”显然是说阿房宫所在的上林苑,而不是阿房宫,因为阿房宫“东西三里,南北五百步”(《宋著长安志》卷3《宫室一》引《三辅旧事》,长安县志局印,1935年),规模甚为明确。

秦上林苑的建设规模显然十分庞大。

然而,无论如何,秦上林苑是位于以阿房宫为中心的地带,而今阿房宫遗址确实离昆明池不远(参见图1)。汉以降,上林苑基本上保持着秦上林苑周回三百余里的面积规模,这从《三辅黄图》所述即可以看得出来:

汉上林苑,即秦之旧苑也。《汉书》云:“武帝建元三年开上林苑,东南至蓝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水而东,周袤三百里。”离宫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汉宫殿疏》云:“方三百四十里。”《汉旧仪》云:“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帝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异。^①

可见,秦上林苑、汉上林苑是与周灵囿一脉相承的,周灵囿与秦汉上林苑的核心地带皆位于今西安市西的昆明池遗址一带,前者是包括在后者之中的。(参见图4)宋程大昌《雍录》有称丰宫“今在鄠县,灵台、灵沼、灵囿皆属其地也”^②,后世学者多承其说。笔者以为,程氏关于灵台、灵沼、灵囿在鄠县(治今陕西户县)的看法,既缺乏有力的史料依据支撑,今所谓灵台遗址也没有发现有说服力周代的遗迹遗存,当是错误的。

传世文献中镐京及其附近的情况如此,那么,出现于金文中的彝(京)的情况又如何?

我们不妨先把出现“彝(京)”字样的20余器铭的时代及相关内容^③罗列如下。

(1)西周早期(武、成、康、昭、穆王)器铭

1、《奢簋》:唯十月初吉辛巳,公妣赐奢贝在彝京。

2、《王孟》:王作彝京中寝浸孟。

3、《戒鬲》:戒作彝宫明尊彝。

4、《方鼎》:唯八月辰在乙亥,王在彝京。

5、《伯姜鼎》:唯正月既生霸庚申,王在彝京湿宫。

6、《臣辰盃》:唯王大禴于宗周、延裸彝京年,……王命土上及史寅殷于成周。

7、《麦方尊》:王命辟井侯出坯,侯于井。粤若二月,侯见于宗周,无尤。合王裸彝京,彭祀。粤若翌日,在璧雍,王乘舟为大丰(礼),王射大鸿禽,侯乘于赤旗舟从,死咸。之日,王以侯入于寝,侯赐玄珣。粤王在斥,已夕,侯赐诸臣二百家,庸用王乘车马、金匚、冕衣、市、舄。唯归,扬天子休,告亡尤,用恭义宁侯显考于井侯。作册麦赐金于辟侯,麦扬,用作宝尊彝。

8、《小臣传簋》:唯五月既望甲子,王[在彝]京,命师田父殷成周年。

9、《伯唐父鼎》:乙卯,王裸彝京。[王]袞辟舟,临舟龙,咸袞,伯唐父告备。王格乘辟舟,临袞白旂,[用]射兕、麋、貉、白鹿、白狐于辟池,咸袞。

10、《鲜簋》:唯王三十又四祀,唯五月,王在彝京,禘于昭王。鲜蔑历裸,王赏裸玉三品、贝二十朋。

11、《通簋》:唯六月既生霸,穆穆王在彝京,呼渔于大池。

12、《静卣》:唯四月初吉丙寅,王在彝京,王赐静弓。

13、《静簋》:唯六月初吉,王在彝京。丁卯,王命静司射学宫,小子及服、及小臣、及夷仆学射。粤八月初吉庚寅,王以吴棨、吕牺合匚师、邦君,射于大池,静教无尤。王赐静鞞。

14、《小臣静簋》:唯十又三月,王裸彝京,小臣静即事。王赐贝五十朋。

①陈直校证:《三辅黄图校证》,第83页

②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1页。

③主要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1—6卷);刘雨、卢岩编著:《近出殷周金文集录》(第1—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下),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四),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1990年;王辉:《商周金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其他器铭内容与所录器铭内容重复或基本重复者不列。为方便阅读理解,释文尽量使用通行字,释文句读据文意略有修改;部分未释或已释有异议者,采用笔者讨论的结果。下录金文释文及断代出处皆同此,不另出注。

15、《史懋壶》：唯八月既死霸戊寅，王在葬京湿宫，王亲命史懋路筮，咸。

16、《井鼎》：唯七月，王在葬京。辛卯，王渔于密永^①，呼井从渔，攸赐鱼。

17、《寓鼎》：唯二月既生霸丁丑，王在葬京□□。

18、《弭叔簋》：唯五月初吉甲戌，王在葬，格于大室，即立中廷，井叔入佑师察。王呼尹氏册命：师察，赐汝赤舄、攸勒，用楚弭伯。

(2) 西周中期（恭、懿、孝、夷王）器铭

1、《卯簋》：荣伯呼命卯曰：载乃先祖考夷司荣公室，昔乃祖亦既命乃父夷司葬人……今余唯命汝夷司葬宫、葬人。

2、《楚簋》：唯正月初吉丁亥，王格于康宫，仲棚父入佑楚立中廷，内史尹氏册命楚赤黻、燕旂，取五铎，司葬鄙官入师舟。







(3) 西周晚期（厉、宣、幽王）器铭

1、《召伯虎簋》：唯六年四月甲子，王在葬。

2、《训匜》：唯三月既死霸甲申，王在葬上宫。

由上可见，关于葬（京）的铭文虽然西周早、中、晚期都有，但周王在葬（京）的活动明显集中于早期，中晚期极少，甚至，葬京的名称在中晚期都被去掉了“京”字，这似乎可反映作为都城的葬京其地位在中晚期有巨大下降。而由上述铭文内容，我们无疑可以总结出葬京的以下五点特征：其一，葬京也有一个“璧雍”（《麦方尊》）。《三辅黄图》有云：周文王辟雍“亦曰璧雍”^②。可见辟雍、璧雍为一。顺便说，葬京都城地位在中晚期的巨大下降，很可能就与中晚期辟雍的淤浅、干涸有关^③，因为葬京赖以都的有利条件就是其在关中平原所具有的独特水体环境，辟雍的淤浅、干涸，也就意味着葬京对周王贵族已缺乏很大的吸引力。葬京称呼的变化似乎可以印证此点。从金文来看，西周五个具有都城功能的城邑（参见后）中，只有葬京有时带有“京”字后缀。葬京之所以称“京”，自然不是以其作为都城的标志，而可能是由于葬（镐）的附近有前述灵台的存在，因为京的本义即为土筑的高丘。《说文》云：“京，人所为绝高丘也。”葬

京在中晚期之所以多称葬，也有可能是由于辟雍淤浅、干涸后，辟雍岸边的灵台已失去作为观览、游憩性建筑的意义。璧雍又可以异写作“密永”（《井鼎》），或称“辟池”（《伯唐父鼎》）、“大池”（《静簋》）。这样一地异名的情况，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某些西周地名的位置之谜：一是“密”、“毕”的位置，一是“程”、“毕郢”^④、

①按：“密永”二字，原文作，为葬京的大水体名无疑，而葬京边的大水体无他，必然是指“璧雍”（《麦方尊》）、“大池”（《通簋》、《静簋》）。“密”西周甲文或作（陈全方等：《西周甲文注》，第6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金文或作（《虎簋盖》）、（《越簋》），与此首字上部同为“宀”，而首字中部“𠂔”，与《南宫乎钟》铭文之“𠂔（必）”近同，似是“必”字异体，右下两小撇可能是表重写“必”字的符号，故疑首字为“密”字的变体；《师遽方彝》之“永”作，与此次字近同（金文中“永”字多见，笔画、构形常有一定变化）。以此，二字当隶作“密永”。《井鼎》铭文的意思是说，王去密永钓鱼，叫井随从。密永，当即辟雍之同音异写（参见后）。金文中另有地名“永”，如《嗣从盂》（厉王时器）铭有云：“王在永师田宫。”意思是说周王住在永邑驻军的田宫。永邑当即程邑异写，位于辟雍西岸（参见后）。《殷周金文集成释文》隶二字作“𠂔池”，前字不识，后字作“池”，却与《通簋》之“池”字作形差异巨大，疑误。

②陈直校证：《三辅黄图校证》，第111页。

③按：如前文所论，早在周文王时就有疏浚“灵沼”之举，这其实反映的是作为湖泊水体的辟雍在商末时已经开始淤浅。从上录金文可见，西周中后期再也见不到“辟雍”的记载。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周所周知的商周之际全新世大暖期（距今8000—3000年）的结束（参见王绍武等编著：《现代气候学概论》，第83—86页，北京：气象出版社，2005年）正好呼应。因为，距今3000年前大暖期的结束，意味着冷干气候的到来，商末辟雍湖泊水体开始的沼泽化或淤浅、趋干，其实就是关中平原区冷干气候到来所导致的结果。当然，这并不排除个别或少年份因降水量较多而出现辟雍水面较广的情况，如穆王时期金文多次提及在辟雍（大池）的活动，可能就此间辟雍水面较广有关。关于距今3000余年前关中平原的环境改变问题，可参见黄春长：《渭河流域3100年前资源退化与地人关系演变》，《地理科学》2001年第1期。

④《孟子·离娄下》云：“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是知毕郢为文王的卒地。

“毕烝”^①“毕程”^②等的位置。谜题的答案简单就是：毕、密为一地的异写，程为毕郢、毕烝、毕程的略写兼异写，毕郢、毕烝、毕程则为水体名称辟雍的聚落地名转化。这是由于上古时代，程、郢、烝三字读音近同，辟、毕、密三字读音近同所致。上古程、郢二字读音相同，清代已有学者指出^③，而烝与程、郢的读音同样很近：上古烝为章母蒸部，程（郢）为定（余）母耕部，章母、定（余）母可以互谐，蒸、耕二部皆为阳声韵；而辟、毕、密三字声母皆为双唇音，韵部近同，故上古因发音近同而通用^④。因此，密永、辟池、辟（璧）雍以及毕郢、毕程、毕烝等的得名，皆与密（辟、毕）地之大水池有密切关系。^⑤其实，传世文献中我们熟知的“崇国”之崇，也当是雍、永、烝、程、郢诸字的异写。试看《史记·周本纪》中关于周灭崇的过程记载：

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乡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纣大说，……乃赦西伯。……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

崇侯之国（邑）何在？《史记正义》引皇甫谧云：“夏鲧封。虞、夏、商、周皆有崇国，崇国盖在丰、镐之间。《诗》云‘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是国之地也。”可见，崇侯之国（邑）就在丰、镐一带。这样的位置显然会把辟雍包括在内的。但是，关中平原上的这样一个著名古国（邑），且与周人为邻为敌，却在西周甲文、金文中毫无提及，这当然很不正常，说明甲文、金文中可能有另外的名称表达。崇，上古崇母冬部，与烝、程的读音极近，当为音近异写。之所以出现雍、永、烝、程、郢、崇这样一些近音、同音异写字，当是因为不同时代不同地方记录者的方言发音、书写习惯、知识素养差异所致。当然，雍、永、烝、程、郢、崇诸字的读音虽然近同，但使用时是作水体名还是水边聚落名应有一定区别：辟雍、密永等双字连写当指湖泊水体，毕郢、毕程、毕烝、程、崇、永等名称则指湖边聚落。这与春秋战国时期常见的楚都名称“郢”的

得名原因类同。最近公布的清华简《楚居》^⑥有谓“至武王畚达，自宵徙居免，焉始□□□□福。众不容于免，乃溃疆涅之陂而宇人，焉抵今日郢”，即是说楚人名郢之地与壅（涅）水之地有关，意即“郢”为“涅”的聚落地名转化。学界一直不清楚文献中密、毕、程、崇的准确位置何在，知道了这样的关系，主要依据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即可以比较清楚、完整地了解周人与古密（毕）人（地）关系的来龙去脉（下录冒号后文字除注明来源外皆为今本《竹书纪年》原文，【】中文字为笔者的说明）：

（1）季历时期

殷武乙 24 年：周师伐程，战于毕，克之。【此时仅距周人自豳（邠）迁岐 20 余年。此为周人居岐（周原）后的首次对外军事行动。可见，

①《段簠》（懿王时器）有云：“唯王十又四年十又一月丁卯，王在毕烝。”

②《逸周书·史记解》有云：“昔有毕程氏，损禄增爵，群臣貌匱，比而戾民，毕程氏以亡。”毕程氏，当指居住于毕程地方的部落首领。

③孔广森：《经学厄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22 页）云：“郢与程通。……毕者，程地之大名；程者，毕中之小号也。……《吕览·具备篇》云：‘武王尝穷于毕程矣。’毕程即毕郢。”孔氏这样的说法大体是正确的。

④三字发音近同通用的例证如下：（1）毕通辟：《周礼·大司寇》：“使其属辟”，郑玄注：“故书‘辟’作‘避’。”见《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第 910 页。古足、走（辵）二部首常通用。（2）毕通密：《吕氏春秋·仲春纪》：“寝庙必备。”毕沅注：“必，《月令》作毕，古通用。”见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上册），北京：中国书店，1985 年，卷 2 第 3a 页。又上古密同宓，从宓得声（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 339 页下）。

⑤过去有学者认为毕地或在渭河以北，而密或密须则在今甘肃灵台。应该说，这样的看法较为晚出，都缺乏强有力的证据支持。现在，知道了辟雍、密永为一，则文献中相关的一些矛盾记载即可以迎刃而解。例如，今灵台县之所以于唐天宝元年改名，唐人说是因为该地为古密国之地（《元和郡县图志》卷 3《关内道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56 页）。可见，唐以前民间可能就有灵台在密地的传说。这正好可辅证前文所获周灵台位置应与辟雍相依的结论，也可辅证密、辟、毕为一地异写的正确性。

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 年，第 180—194 页。

程地必定对周人具有很大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可能来自于程地所拥有的湖泊辟雍。在黄土高原区,像辟雍一样的大面积湖泊水体十分罕见。前述在距今约3000年前后,全新世大暖期结束,气候逐渐变得冷干,而属于渭北旱原的岐下周原一带,虽然在雨水丰沛的年份,会出现《诗经·大雅·绵》所谓“周原膴膴,萑茶如飴”的景象,但在气候冷干的背景下,这里地势偏高、水源不足,多数时间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并不优越,这大约是周人要设法夺取自然条件更好的生存空间的原因。毕即后来所谓“毕原”。《史记·魏世家》“正义”引《括地志》:“毕原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唐万年县即在今西安市区。程即前述其他文献中所称的“崇国”。“国”为城邑之意,故上引皇甫谧谓“崇国盖在丰、镐之间”(参见图1)】

殷文丁5年:周作程邑。【上距“伐程”16年。周原甲骨卜辞H31:5有云:“密囟(思)城”^①,是说周人想在密(毕)地修建城邑。这当就是周人“作程邑”前的占卜实录】

(2) 西伯昌(文王)时期

殷帝辛6年:西伯(文王)初禘于毕。【上距“作程邑”23年。禘,春祭,很可能是在程邑进行】

殷帝辛23年:囚西伯于羑里。【崇侯虎谗西伯于殷纣王(帝辛)所致】

殷帝辛29年:(帝辛)释西伯;诸侯逆西伯,归于(程)[周]。【此处“程”当为“周”之误。由于文王被囚羑里6年,程邑在此间应为崇侯虎收复,故才有下文帝辛33年“密人降于周师,(西伯)遂迁于程”的情况出现。《史记·周本纪》记文王获释后事有曰:“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亦可证】

殷帝辛31年:西伯治兵于毕,得吕尚以为师。【为伐毕(密)作准备。吕尚,即姜太公】






殷帝辛32年:密人侵阮,西伯帅师伐密。【西伯借口密(毕)人侵阮而伐密。《诗·大雅·皇矣》亦为此次战事的记录,诗云:“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帝谓文王,……以伐崇墉。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临冲茀茀,崇墉屹屹,是

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即其事。该诗中的“崇墉”其实是数十年前周人自己修建的城池程邑,而此时已变为密人抵抗周人的堡垒。可见,密、崇(程)确是联系在一起的。周原甲骨卜辞H11:136号有云:“今秋王囟(思)克往密。”这是说该年秋天周王打算去伐密。显然,这当就是周人在制定伐密计划过程中的卜筮实录。《史记·周本纪》记作“明年,伐密须。”^②】

殷帝辛33年:密人降于周师,(西伯)遂迁于程。【密(毕)人投降后,周文王从岐周迁居于程。《逸周书·大匡》有云“维周王宅程”,当其时。此亦进一步证明密、程是相联系的】

殷帝辛34年:周师取耆及邶,遂伐崇,崇人降。【此条“伐崇,崇人降”与上二条伐密、密人降为一事。这当是因《竹书纪年》作者所据原始材料来源不同而在时间记载上略有差异。西汉末年成书的《易乾凿度》作:“(文王)二十九年,伐崇,作灵台。”^③又略不同】

殷帝辛35年:西伯自程迁于丰。【《史记·周本纪》直接说文王“自岐下而徙都丰”,省略了居程的经历。文王自程迁丰可能是由于天灾。《逸周书·大匡》云:“维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本年正好是周文王在程邑居住的第三年,所谓“天之大荒”自然是指年成极不好,而关中平原年成不好最有可能是干旱导致的。连年干旱很可能造成程邑旁的水体“辟雍”趋干,周文王居住于此生活不便。程邑的位置当今长安县普渡村、花园村一带,正位于“辟雍”水体西岸,据称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11处“镐京

①按:“囟”为西周甲文中的常见字。陈全方等《西周甲文注》释此“密囟城”为“密为城”(第68页),即把“囟”字原文字释作“为”;但另处“今秋王克往密”一句,陈氏又释为“西”(第65页),可见陈氏所释当误。笔者以为,李学勤、王宇信、夏含夷等学者释为“思”字(参见李学勤、王宇信《周原卜辞选释》,《古文字研究》第4辑,1980年;夏含夷《试论周原卜辞字》,《古文字研究》第19辑,1989年),可从;但“思”并不是虚词、副词、连词之类,而简单就是其本义“考虑、打算”的意思。

②“密须”之名,另见于《左传》昭公十五年、定公四年。密当为密须之略读。

③王应麟:《玉海》卷162《宫室·庭台》,“周灵台”条引《易乾凿度》,第2980页。

西周宫室夯土基址”^①。但此地事实上并不是镐京，而应是程邑。皇甫谧所谓“崇国（指程邑）盖在丰、镐之间”，与其相对位置正合（参见图1）。进入西周后，这里可能慢慢成为田猎之地。上录《鬲从盨》（厉王时器）铭文有云：“王在永师田宫。”因为“永”亦是程、崇的异写，而“师田宫”是指周朝军队系统的田猎之宫，所以，作为田猎之地，前述今天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贵族墓群是不奇怪的】

殷帝辛 36 年：西伯使世子发营镐。【周文王都丰邑后，大概想通过在距程邑不远（约 1.5 公里）、同在辟雍湖滨的镐修建新的宫室，作为丰邑近郊的王公贵族游憩、渔猎地。工程活动由其子发（周武王）负责。今本《竹书纪年》有云：“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为宫室，因名蒿室。既有天下，遂都于镐。”此“营镐”与前 1046 年灭商后“都于镐”在时间上约相隔 28 年】

殷帝辛 37 年：周作辟雍。【前述商未辟雍湖泊水体已有沼泽化或淤浅、趋干的迹象。这里当指对作为自然湖泊的辟雍进行疏浚、注水。《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有“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皇王烝哉”一句，其中所谓“丰水东注”与丰水北注渭水的自然流向明显不合。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很可能是颂扬周文王为解决辟雍的水源问题而人工引丰水东流。《水经注》佚文有曰：“自丰水北迳灵台西，文王又引水为辟雍灵沼”；又曰：“交水又西南流，与沔水支津合，其北又有汉故渠出焉；又西至石碣，分为二水：一水西流注沔，一水自石碣北径细柳诸原北流，入昆明池。”^②可见，古代沔（丰）水确实可以循今交河（沔水支津）河道东流汇古交水再北注昆明池（辟雍）的。（见图 1）】

殷帝辛 40 年：周作灵台。【指利用疏浚辟雍挑出的堆在湖岸附近的泥土，在湖边修筑具有观赏作用的高台式建筑物。（见前）】

殷帝辛 41 年：西伯昌薨。【《孟子·离娄下》云：“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伯昌（文王）大概是在新修整的辟雍湖畔的宫殿（毕郢）休养时逝世】

（3）武王时期（？—前 1043 年）

9 年：武王上祭于毕。【据《史记·周本

纪》】

（4）成王时期（前 1043—前 1020 年）

元年：葬武王于毕。

22 年：葬周文公于毕。【周文公即周公。《史记·周本纪》：太史公曰：“……所谓‘周公葬于毕’，毕在镐东南杜中。”】

（5）康王时期（前 1020—前 996 年）

12 年：王如丰，锡毕公命。【周武王克殷后，封周文王庶子高于毕（密），毕（密）成为毕公高采邑，始改为姬姓，姬或写作姑。这就是应劭所谓“密须氏，姑姓之国”^③、韦昭所谓“康公，密国之君，姬姓也”^④的来历。（见前录《尚书·周书·毕命》）】

（6）穆王时期（前 976 年—前 922 年）

14 年：翟人侵毕。【翟同“狄”，指关中平原以西以北的游牧民族部落】

（7）共（恭）王时期（前 922 年—前 900 年）

4 年：王师灭密。【《国语·周语一》载有共王灭密康公的故事。密（毕）康公当为毕公高之后代。此后再无密（毕）的记载，亦可辅证密、毕为一】

（8）懿王时期（前 899 年—前 892 年）

7 年：西戎侵镐。【西戎，即指獫狁。《诗经·小雅·六月》有云：“獫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当指此。镐（京）宫室可能因此被毁而至荒芜】

（9）宣王时期（前 827 年—前 781 年）

30 年：有兔舞于镐京。【可见镐京一带已完全荒芜。宣王时器《吴虎鼎》铭谓“厥西疆，莽姜及疆”，即指镐京一带其时已为姜氏居住。此后文献再无镐（京）的明确记载】

其二，莽京有周王的宗庙和宫室。《弭叔簋》铭所谓“大室”，应就是太庙（见后）。《卯簋》、《戒鬲》中的“莽宫”，直接以地名名宫，好比

^①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镐京西周宫室》，第 3—7 页。

^②《玉海》卷 162《宫室·庭台》“周灵台”条引、《宋著长安志》卷 12《长安县·交水》引《水经注》。

^③《史记·周本纪》“集解”引。

^④《国语》卷 1《周语上·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终必亡》韦注。

“周庙”、“酆宫”之名分别指周、丰（酆）二地的太庙一样，很可能也是指豳京的太庙。至于《麦方尊》所谓“寝”，《王孟》所谓“豳京中寝”，《训匭》所谓“豳上宫”，《史𩰫壶》、《伯姜鼎》所谓“豳京湿宫”，应该都是属于豳（京）在不同时期不同类型和位置的周王宫室。这些西周宫室已有一定的遗迹发现。据报道，在沣东遗址北半部的洛水村周围发现三处西周宫室建筑遗存：一是在洛水村西边村旁发现一座不辨形制的西周初期大型夯土基址和一个大卵石柱础，二是在洛水村村北靠近一处断崖的地面上发现一座不辨形制的西周大型夯土基址，基址上堆积着大量的西周板瓦碎片，三是在洛水村村北西周夯土基址附近曾发现一口西周水井，井内埋藏着大量板瓦及涂抹着“白灰面”的草筋泥土块墙皮等西周建筑遗存。^①

其三，豳京有“学宫”存在，辟雍亦充教学场地。这可以通过上录《静簋》铭文反映出来。这段铭文的意思是说：六月丁卯这天，住在豳京的周（昭）王，命静在学宫教习射箭，让一批年轻的贵族子弟、低级官员跟着学习；在八月初吉庚寅这天，周（昭）王与一众贵族、君主前往大池（辟雍）中射箭，静又不厌其烦地进行讲解，于是周（昭）王赐给静一个漂亮的刀鞘。可见，汉以降的辟雍之所以发展成王朝的教育场所，虽然可能受到春秋以降的误识影响，但显然还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

其四，周王常常来豳京喝酒、渔猎。从上引文中可以看到，《臣辰盃》、《麦方尊》、《小臣静簋》、《伯唐父鼎》诸器铭中都说周王“裸豳京”。裸是什么意思？《诗经·大雅·文王》毛传谓“裸，灌鬯也。”^②鬯即古代祭祀、宴饮用的香酒。灌鬯之礼当就是饮酒之前的一种祭礼，如以酒洒地之类^③。这可能与西周时期周王曾明令禁止聚众酗酒，只有在祭祀时可以饮酒^④的规定有关。因为，如果先行灌鬯之祭礼，周王贵族就可以借裸祭之名饮酒。《鲜盘（簋）》所谓“鲜蔑历裸，王赏裸玉三品、贝二十朋”，则说明陪同周王饮酒的人也得到了周王赏赐的饮酒玉器等。至于《逯簋》所谓“穆穆王在豳京，呼渔于大池”、《井鼎》所谓“王渔于密永，呼井从渔”，很明显是说周王在豳京辟雍钓鱼或捕鱼；《麦方尊》、

《伯唐父鼎》则反映周王在辟雍进行的射猎活动（辟雍湖的水面上以及湖中的岛屿上当有鸟兽生活。参见图1）。

其五，豳京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卯簋》所谓“今余唯命汝夷司豳宫、豳人”，意思是任命卯来管理豳宫、豳人。《楚簋》所谓“司豳鄙官”，可能就是豳京管理机构的官员之一。

综上所述，传世文献中的“镐京”与金文中的“豳京”，不但位于同样的地域“辟”地，有着同名的地理标志物——辟雍，而且发挥着几乎完全一样的功能：祭祀、居住、宴饮、娱乐、教育等。因此，镐京、豳京应是一地异写无疑。其实，豳京或镐京是相对晚出的写法，在西周早期的出土文献中，豳本是写作“蒿”的。如西周初年甲骨文有“祠，自蒿于丰”（H11：20）、“祠，自蒿于周”（H11：117）^⑤字样；《德方鼎》也有“王在成周，延武王福自蒿，咸”^⑥的记载。之所以称“蒿”，《大戴礼记·明堂》如此说：“周时德泽洽和，蒿茂大，以为宫柱，名蒿宫也，此天子之路寝也。”前引今本《竹书纪年》的说法也差不多：“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为宫室，因名蒿室。”蒿宫、蒿室当可异写作豳宫，

①胡谦盈：《周文化及相关遗存的发掘与研究》，第25—26页；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考古队：《1961—62年陕西长安沣东试掘简报》。前已述及，今天考古工作者在斗门镇普渡村、花园村发现了11处西周建筑基址，而最大的五号基址总体长59米，宽23米，面积为1357平方米，主体结构布局坐北朝南，平面呈“工”字形，由主体建筑和左右两翼附属建筑、夯土墙及墙基部分组成（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镐京西周宫室》，第12页）。但是，对于五号基址的情况，胡谦盈提出严重质疑（见所著《三代都址考古纪实——丰、镐周都的发掘与研究》，第10页）。笔者以为，五号基址如果属于西周宫殿，很可能是前述周人在程（永）邑所建宗庙、“师田宫”之类，不过，此地虽距豳京甚近，却是另一个城邑。

②《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962页。

③《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420页）唐孔颖达疏有云：“裸，灌也。王以圭瓚酌鬯之酒以献尸，尸受祭而灌于地，因奠不饮谓之裸。”《说文》：“尸，神像也。”

④《尚书·酒诰》。

⑤陈全方等：《西周甲文注》，第15、20页。

⑥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第26页。

上录《卯簋》、《戒鬲》即有“葬宫”之名。《大戴礼记》、今本《竹书纪年》的意思其实应该是说，由于辟雍一带蒿草茂盛，于是就地取材^①，修建以蒿草为主要建筑材料（如墙体材料、屋顶覆盖材料）的蒿宫。稍后，又有把葬简写作“旁”的，如周康王时器《高卣》铭文有“唯十又二月，王初裸旁”字样。研究者早就指出，葬、旁的读音相同^②。在传世文献中，镐则明确有鄙、滈等异写^③。有研究者已经论证，上古时代的关中一带，蒿（镐、鄙、滈）、葬（旁）二者的读音本是差不多的，后来二者之间之所以出现巨大的读音差异，应是不同时代地方方音演变的结果^④。这样的说法是合理的。此外，金文中出现的“減”，也当是鄙、滈（沔）等字的异写（参见后）。

二 宗周与丰（邑）

知道了传世文献中的“镐京”与金文中的“葬京”为一，为我们研究宗周是不是镐京的问题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宗周的记载同样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中都有。

传世文献中关于宗周的记载不是很多。一是《尚书·周书·多方》有谓：“唯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尔四国多方，唯尔殷侯尹民。我唯大降尔命，尔罔不知。洪惟图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这是说在五月丁亥这天，周王从奄回到了宗周，要周公向各诸侯国宣示周王的旨意。后来，这事被司马迁写入了《史记·周本纪》（见后引）。二是今本《竹书纪年》中的数处记载。如“（成王）十九年，……召康公从，归于宗周，遂正百官，黜丰侯”，是说周成王在宗周任命百官，贬黜了丰侯。丰侯应该就是以宗周所在地丰为采邑的诸侯。证之金文，除了数见“丰王”（指周文王）之外，确实只见“丰伯”之称——此或是贬黜丰侯的结果。三是《诗经》中的记载。《诗经·小雅·正月》有谓：“燎之方扬，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这是说褒姒把强盛的“宗周”给毁灭了。《诗经·小雅·雨无正》则谓：

宗周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

莫肯朝夕。……谓尔迁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无言不疾。昔尔出居，谁从作尔室？

这里描述的是西周末年被破坏后的“周宗”（即宗周）的萧条情形：正大夫、三事大夫（即太师、太傅、太保）和邦君诸侯（各诸侯国国君）都已不在这里居住。对于传世文献中出现的宗周或周宗，如前所述，汉以来的学者们都认为是镐京。但是，只要仔细阅读上述关于镐京的相关记载，我们很容易发现，镐京给我们的印象与宗周给我们的印象是明显不同的：镐京呈现的多是轻松的气息，而宗周显示的多是严肃的氛围。这一点，从下述出土器物铭文中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反映。

出土器物铭文中关于宗周的记载较传世文献多得多。为便于研究，不妨把现有金文中有“宗周”字样的简明内容分时期条列如下。

（1）西周早期（武、成、康、昭、穆王）器铭

1、《乍册觶（畏）卣》：唯公大史见服于宗周年：在二月既望乙亥，公大史咸见服于辟王，辨于多正；四月既生霸庚午，王遣公大史，公大史在丰，赏作册觶（畏）马。

2、《献侯鼎》：唯成王大袞在宗周，赏献侯器、贝，用作丁侯尊彝。

3、《大盂鼎》：唯九月，王在宗周。

4、《奚方鼎》：唯二月初吉庚寅，在

①按：当时可能还制作有专门用于刈除蒿草的“鑄”。西周铜器有《鬲司土（徒）鑄》，铭文为“鬲司土（徒）北征蒿鑄”七字，唐兰理解为司徒北征到蒿（镐京）而要用鑄（唐兰：《中国古代社会使用青铜农器问题的初步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第10—34页）。笔者以为，释为司徒（从丰邑出发）北征蒿（镐）地时所使用的鑄，可能更准确。（参见图1）由此，可知该器的制作年代当在懿王7年“西戎侵镐”之时。

②吴大澂：《说文古籀补·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69页上。

③例如，《水经注》卷19《渭水》中镐水又写作鄙水；《荀子·议兵》所谓“古者汤以薄，武王以滈，皆百里之地也”，在《荀子·王霸》中则作“汤以亳，武王以鄙，皆百里之地也”。

④周宏伟：《楚人源于关中平原新证——以清华简〈楚居〉相关地名的考释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2辑。

宗周。

5、《鬯尊》：唯公男祓于宗周，从。

6、《鬯作父乙尊》：唯公遘于宗周，睦从公。

7、《静方鼎》：唯七月甲子，王在宗周，命师中及静省南国，相艺居。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

8、《麦方尊》：王命辟井侯出坯，侯于井。粤若二月，侯见于宗周，无尤。合王裸彝京，彭祀。

9、《臣辰盃》：唯王大禴于宗周、延裸彝京年。

10、《庸伯鬯簋》：唯王伐速鱼，遂伐淖。黑至，燎于宗周。

11、《董鼎》：匭（燕）侯命董饴大保于宗周。

12、《羿彝》：唯八月甲申，公中在宗周，赐羿贝五朋。

13、《匭侯旨乍父辛鼎》：匭（燕）侯旨初见事于宗周，王赉旨贝廿朋。

14、《班簋》：唯八月初吉在宗周；甲戌，王命毛伯更虢城公服。

15、《史叔隋器》：唯王祓于宗周，王姜、史叔吏于大保，赏叔隋鬯、白金。

16、《善鼎》：王在宗周，王格大师宫。

17、《元年师事簋》：唯王元年四月既生霸，王在泂居；甲寅，王各庙即立，徯公入右师事，即立中廷，王呼作册尹册命师事曰：备于大左，官司丰还（及）左右师氏。

（2）西周中期（恭、懿、孝、夷王）器铭

1、《同簋》：唯十又二月初吉丁丑，王在宗周，格于大庙。荣伯佑同立中廷，北向。王命同佐佑吴大父，司场、林、虞、牧，自虢东至于河。

2、《趯簋》：唯二月，王在宗周。戊寅，王格于大庙。密叔佑《趯即位，内史即命。

（3）西周晚期（厉、宣、幽王）器铭

1、《大克鼎》：王在宗周，旦，王格穆庙，即立。

2、《小克鼎》：唯王廿又三年九月，王在宗周，王命善夫克舍命于成周。

3、《微鬯鼎》：唯王廿又三年九月，[王]在宗周，王命微鬯司九陂。

4、《史颂鼎》：唯三年五月丁巳，王在宗周，命史颂……于成周。

5、《晋侯苏编钟》：唯王卅又三年，王亲遘省东国、南国。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二月既望癸卯，王入格成周。

从这些材料可知，在整个西周时期，周王在宗周一直没有停止过活动，早期的活动明显较多，而中晚期的活动则相对较少。进行这些活动的场所以及活动内容大致可以归纳四点。第一，宗周有大庙、穆庙等宗庙建筑物。《同簋》、《趯簋》所谓“大庙”，即太庙，是安放周王先君神位的建筑物。《大克鼎》所谓穆庙，是祭祀周穆王的建筑物。（参见后）第二，宗周有大师宫之类的官署，是大师、大保等重要官员的办公地。《善鼎》所谓“大师宫”，应是指太师的办公兼居住场所。太师居周初“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之首，为辅弼周王之官。《史叔隋器》所谓“大保”就是太保，亦为“三公”之一。三公官署的存在，说明宗周是西周王朝重要政治事务的进行地。《诗经·国风·王风》中有一首很伤感的诗《黍离》，毛传释该诗的写作背景时有曰：“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①可见，传世文献关于宗周有宗庙、宫室的记载，能够呼应金文中的内容。第三，宗周是各地诸侯述职的主要场所之一。如《匭侯旨乍父辛鼎》所谓“匭（燕）侯旨初见事于宗周”，是说燕侯在宗周向周王述职；《乍册虢（畏）卣》所谓“唯公大史见服于宗周”，是说公大史在宗周向周王述职。这进一步说明宗周在当时的重要政治地位。第四，宗周是举行大型祭祀活动的地方之一。如《献侯鼎》所谓“唯成王大祓于宗周”，《臣辰盃》所谓“唯王大禴于宗周”。祓为祈福祭，禴（杓）为春祭。

可见，把宗周的情况与前述镐京的情况相比，会发现二者确有很大的差异，应不会是一地。其实，从有关金文中宗周与镐京同称的情况，也可以证实此点。上录《麦方尊》所谓“王

^①《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252页。

命辟井侯出坯，侯于井。粤若二月，侯见于宗周，无尤。合王裸彝京，酏祀”一句，是说周王命令辟井侯出朝作井（荆）地的诸侯，及至二月，辟井侯在宗周拜见了周王；正好周王要去彝京举行裸祭，辟井侯于是一同前往。《臣辰盃》所谓“唯王大禴于宗周、延裸彝京”，是说周王在宗周举行大型春祭活动之后，接着又去彝京参加裸祭。显然，如果宗周与彝京是一处，则完全不应并称。


宗周与彝京既然不是一处，那么，宗周又在哪儿？从道理上说，应该是文王所都之丰（酆）邑。看看有关明确记载丰邑的材料，即可以发现，第一，丰邑确实是周王进行重要政治经济活动的地方。今本《竹书纪年》有载：周武王十二年牧野之战后的“夏四月，王归于丰，飨于太庙。十三年……荐殷于太庙，遂大封诸侯。”这是说周武王先后在丰邑的太庙开庆功宴会及大封诸侯。《左传》昭公四年在回顾西周诸王的重要功业时有云：“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括地志》云：“周酆宫，文王宫也。”由于文王属于周朝王室先君之列，酆宫或文王宫应就是太庙的俗称。所谓酆宫之朝，是说周康王在酆宫（太庙）接受诸侯朝见。丰邑也是册命重要官员、举行重要仪式的场所。《逸周书·大开武》有曰：“维王一祀二月，王在丰，密命访于周公旦。”这是说武王在丰与周公旦密谋灭商之事。周公旦为周初太傅，乃“三公”之一。金文召公《玉刀铭》有曰：“六月丙寅，王在丰，命大保省南国……。”这是说周王在丰邑颁令大保召公南巡。大保即太保，亦为周初“三公”之一。这显然与《董鼎》“匱（燕）侯命董飴大保于宗周”、《史叔隋器》“王姜史叔吏于大保”的内容可以呼应。《史记·鲁周公世家》亦曰，“（成）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裘卫盃》则载有一次有周王参加的重要经济活动：

唯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王禹旂于丰。矩伯庶人取瑾璋于裘卫，值八十朋，厥贮其舍田十田。矩或取赤琥两、鹿棗两、棗鞞一，值廿朋，其舍田三田。裘卫乃矢告于伯邑父、荣伯、定伯、亮伯、单伯。乃命三有司：司徒微邑、司马单與、司工（空）邑

人，服还授田。

这是说周王在丰邑举行仪式，见证矩伯与裘卫之间的土地交易。第二，丰邑建有太庙，多有西周百官贵族居住。由上引今本《竹书纪年》周武王“荐殷于太庙，遂大封诸侯”事可知，丰邑是有太庙的。而从上引《逸周书·大开武》、《裘卫盃》等的记载来看，丰邑也很可能是周初三公、三司（司徒、司马、司空）等重要官员和伯邑父、荣伯、定伯、亮伯、单伯等一些贵族的居住地。第三，丰置有专门的管理者“大左（祝）”。穆王时器《元年师事簋》有云：“唯王元年四月既生霸，王在泂居；甲寅，……王呼作册尹册命师事曰：备于大左，官司丰还（及）^①左右师氏。”稍后的西周恭、懿时器《申簋盖》则云：“唯正月初吉丁卯，王在周康宫，格大室，即位。……王命尹册命申：赉乃祖考丕大祝，官司丰人及九□祝。”此二器的器主师事与申很可能是爷孙关系，所以，申能袭其祖任“大左（祝）”。大左（祝）可能是属于司徒系统的官职^②，其首要职责显然在于管理丰邑的土地与人民。第四，宗周即丰有较明确的文献记载。《史记·周本纪》有载：

成王既迁殷遗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

^①“还”（原文作），郭沫若释作“苑”，唐兰、李家浩释作“县”（参见李家浩：《先秦文字中的“县”》，《文史》第28辑，1987年），似皆误。对照下《申簋盖》铭“官司丰人及九□祝”句，知此“还（還）”为“及（棗）”之误写无疑。棗即“還”，還异作還，当因形近而误，就像前录《伯公父簋》铭文“我用召卿事辟王”句中“卿”字应为“飨”字一样。其实，这从《方言》中的有关记载也可以得到证明。例如《方言》第十三有谓：“還，积也”；第三有谓：“還，及也”。《荀子·非相篇》唐杨倞注引《方言》有云“儼，疾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4页）。积、及、疾三字上古读音当近同，由此而知，還、還、儼三字的上古读音亦当近同，且都可借作“及”字用。参见后录《免簋》铭文。

^②“大祝”与“大左”音近（如今粤方言“祝”读tʃuk⁷，“左”读tʃɔ³。见李珍华、周长楫编撰：《汉字古今音表（修订本）》，第24、301页），疑为异写。《周礼·天官》有“大祝”，主掌祭祀类事，与此师事、申的主要职责明显不同。山东出土的春秋时器《鲁大左司徒元鼎》有“大左司徒”一名，故疑此大左或为大左司徒的略称，属于地官系统。

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

这是记周成王东伐后回归的地方，先说归在宗周，后说归在丰，好像宗周、丰是二地，历来学者也因此被误导。其实，周成王御驾东征仅有一次，约发生在成王四年至五年间，往复时间大约延续半年左右。今本《竹书纪年》记该事时如是说：“（成王四年），王师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迁其君于薄姑。夏五月，王至自奄。”对比两处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即可知宗周即丰无疑。另外，西周初年器《作册驹（畏）卣》有如下铭文可辅证：

唯公大史见服于宗周年：在二月既望乙亥，公大史咸见服于辟王，辨于多正；粤四月既生霸庚午，王遣公大史，公大史在丰，赏作册驹（畏）马。

前面已经指出“辟王”就是周武王，因此，该铭文的大概意思是说：公大史在宗周述职之年，二月既望乙亥那天，公大史向周武王汇报，回答了官员们的质询；到四月既生霸庚午那天，周武王为公大史送行，公大史在丰邑，赏给作册驹马匹。这里宗周与丰（邑）并称，似乎宗周与丰也不是一地，但是，细析文意，就会发现这里的宗周与丰其实同样是一处。因为，该器铭所述为同一事件，只是作册驹在纪年时称宗周，而在纪日时改称丰。这很可能是由于西周早期周人以大事纪年时习惯用大名、正名，而叙述事件具体过程时习惯用小名、俗名的缘故所致。

那么，作为宗周的这个丰邑在哪里？是不是如前述在众所周知的今沣西马王村、客省庄一带？应该说，像一些学者所质疑的一样，马王村、客省庄一带的发掘情况并不能支持有关丰邑方位的文献记载。其一，是丰、镐之间的距离问题。《史记·周本纪》“集解”引晋徐广曰：“镐在上林昆明北，有镐池，去丰二十五里。”这是说镐在汉上林苑的昆明池北，丰、镐二地相距25晋里。如前所述，按目前的主流认识，周都丰（邑）的位置大体被确定在今西安市长安区沣河西岸的马王村、客省庄等地一带，镐（京）的位置大体被确定在沣河以东的洛水村、上泉北村、普渡村、花园村、斗门镇一带，而斗门镇、

花园村一带的夯土宫殿建筑基址群被部分学者认为是镐京的中心。如果马王村、客省庄一带是丰邑中心的话，那么，斗门镇、马王村二地的距离只有约2.5公里。显然，这个距离与文献记载的“二十五里”（约当13公里）差距太大。其二，是丰与鄠县之间的距离问题。汉唐间鄠县即当今户县。皇甫谧《帝王世纪》说：“丰在京兆鄠县东，沣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周丰宫，周文王宫也，在雍州鄠县东三十五里。”清乾隆《鄠县新志》亦称：“周丰宫，旧志一名鄠宫，在沣水西，去县三十里。”^①所谓“周丰（鄠）宫”，自然应该在周都丰邑。唐“三十五里”、清“三十里”，皆约当今15公里。距今户县东15公里左右的地方属于该县秦渡镇附近，正在沣河西岸。让人惊讶的是，今秦渡镇附近一带确实有过较大规模的西周时期聚落存在。如该镇溁沱村遗址的情况^②如下：

溁沱村遗址位于西安市户县秦渡镇溁沱村东北300米沣河西岸的二级台地上。西周文化遗址。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约300米，面积约120000平方米。溁沱村遗址文化层厚1—1.5米。出土有石斧、鬲足、陶罐、带孔石镰和带孔蚌刀等。另采集有夹砂红、褐陶片和泥质褐陶片，纹饰主要为绳纹，可辨器型有鬲、罐等。1957年5月31日，溁沱村遗址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由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规模土地平整及砖厂取土，对溁沱村遗址造成很大破坏，现仅中心区域略有保存，可见少量夹砂红、褐陶片。遗址区现为耕地。

而可巧的是，今秦渡镇溁沱村遗址距前考作为镐京所在的洛水村一带正好是13公里左右，与晋徐广丰镐之间相距“二十五里”的说法完全一致。可见，周都丰邑（宗周）的所在应该是在户县秦渡镇溁沱村遗址一带（参见图1、图4），而不是在马王村、客省庄一带。众所周知，今马王村、客省庄一带西周时期墓葬密集，但一直没

^①乾隆《鄠县新志》卷1《地理志一》，第12b页。

^②西安市文物局等编：《西安古遗址》，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4页。

有发现先（早）周宫殿遗址群^①，之所以如此，应当是因为我们已有的考古发掘偏离了周都丰邑的中心。早在清初，已有学者明确指出，“秦渡即古丰地，沔水之西岸，丰旧城在焉”^②，即认为今秦渡镇附近为周都丰邑的所在。笔者以为，这种认识既与早期学者的相关记载^③完全符合，线索古老、清楚，今天又能够得到地面遗迹的支持，且秦渡镇附近位置紧邻沔河西岸，至今没有发现西周时期的任何墓葬分布，符合西周都城其自然、人文环境条件，因而是正确、可靠的。

三 郑与槐里

郑是西周的重要都城，在传世文献、器物铭文中都有明确记载。

传世文献中关于周王居郑的记载如下：

1、古本《竹书纪年》：穆王元年，筑祗宫于南郑。（《穆天子传》注）

2、古本《竹书纪年》：穆王以下，都于西郑。（《汉书·地理志》薛瓒注）

3、古本《竹书纪年》：穆王所居郑宫，春宫。（《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三）

4、今本《竹书纪年》：（穆王元年）冬十月，筑祗宫于南郑。……以下都于西郑。

十八年春正月，王居祗宫，诸侯来朝。……五十五年，王陟于祗宫。

5、今本《竹书纪年》：（懿王）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即位，天再旦于郑。

文献中的“西郑”可能不是西周时期的称呼——这从下录《免尊》等铭文皆单称“奠（郑）”即可以得到证明，而当是《竹书纪年》的作者战国时魏国史官的区别性称呼。因为，春秋时期中原有郑国存在，尽管郑都、郑国有一定联系（参见后），但如果不加前置方位词，西周之郑、春秋之郑会很容易混淆。关中之郑在中原之郑的西面，故称西郑，容易理解。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南郑。从今本《竹书纪年》看，南郑显然是周穆王十分喜爱且常去居住的地方，因为从元年他初登王位即在该地筑祗宫，一直到50余年后他又在祗宫去世。《穆天子传》的最后一句谓“吉日辛卯，天子入于南郑”^④，即可与之呼应。那么，南郑何在？为今陕西汉中市区无疑。理由有二：

其一，汉中名南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水经注·沔水》引《耆旧传》云：“南郑之号，始于郑桓公。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郑为称。”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郑桓公与周幽王一起死于前771年，已是西周结束的时间，而今本《竹书纪年》明明是说周穆王元年已在南郑筑祗宫。南郑既然筑有宫室，自然需要有人管理，可能周穆王在元年都郑之后，即从新都郑邑迁徙了一部分人民南去汉中褒（国）地，这样，位于关中秦岭以南褒地的祗宫所在地也就被人们称为“南郑”。先秦时代人民迁徙新地居住，其新聚落名称往往与原居地名称有联系。其二，汉中一带冬春有较好的气候条件，适宜休养避寒。春季关中平原仍较寒冷，而汉中盆地由于有秦岭对南下冷空气的阻挡，春季平均气温往往要比关中平原高2—3℃。因此，古本《竹书纪年》所称穆王所居的郑宫，应就是指的南郑祗宫。之所以特别称之为“春宫”，意思应当是指穆王经常在春季去那里居住。

器物铭文关于周王居郑的记载如下：

1、《免尊》：唯六月初吉，王在奠（郑）。丁亥，王格大室。并叔佑免，王蔑免历。

2、《大簋》：唯六月初吉丁巳，王在奠（郑）。蔑大历。

3、《三年癸壶》：唯三年九月丁巳，王

①据报道，近数十年在马王村、客省庄一带发现了一些夯土基址，最大的四号夯土基址面积甚至达到1826.98m²，但遗憾的是，这些夯土基址上并没有发现任何柱穴、础石或墙基之类的建筑遗存，故不能称之为宫室基址；且这些夯土基址的上限年代晚于西周初期前段，与文献记载的文王自程迁丰的时间为商朝末年的早（先）周时代亦完全不合。参见胡谦盈：《周文化及相关遗存的发掘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3—2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队：《陕西长安沔西客省庄西周夯土基址发掘报告》。

②《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职方典》第498卷《西安府部·汇考八》，第5页。

③东汉许慎云：“酆，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见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286页下；东汉高诱云：“酆郭在长安西南。”见许慎通《吕氏春秋集释》（上册），卷8第9a页。参见图1。

④郭璞注：《穆天子传》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9页。

在奠（郑），飨醴。呼虢叔召癸，赐羔俎。

《免尊》、《大簋》、《三年癸壶》分别为穆王、懿王、孝王时器。由此可见，一方面，郑有“大室”建筑物存在，说明郑确实如《竹书纪年》所说为周都，因为大室即太庙（参见后），为西周都城的标志性建筑物；另一方面，穆王、懿王、孝王皆在郑地进行册命活动的情况，也相当程度上能够证明《竹书纪年》“穆王以下，都于西郑”的记载可信。

应该说，目前学术界有部分学者已认可西周时期都郑的历史事实^①。但是，对于西周时期作为都城的郑的具体位置，他们却有相当大的分歧。如唐兰从春秋时期棫林的位置考察推测郑在泾水之西的扶风、宝鸡一带；卢连成、尚志儒等主要根据《史记·秦本纪》秦雍城（今陕西凤翔）有“大郑宫”的记载和秦雍城遗址有“棫阳”瓦当发现，进一步推测郑在今凤翔县城一带。无疑，前辈学者的上述工作对于郑都位置问题的解决十分有启发意义，但众所周知，凤翔雍城遗址明确为秦国都城遗址，在西周灭亡近百年后的秦德公元年（前 677 年）才正式启用，显然，以之来证明西周时期的情况说服力不强。因此，笔者以为，要确定郑都的准确位置，还是有必要从直接的文献材料考察入手。

众所周知，郑在春秋时期是著名的诸侯国。郑国的始封者被认为是西周时期的郑桓公。在大家熟知的历史文献中，相关的记载如下。

1、《史记·郑世家》：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幽王以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说。河、雒之间，人便思之。

宣王二十二年即前 806 年。从司马迁的记载看，郑桓公所封的郑，似乎与两个地方有关：一是周地，一是河雒之间。初封之地可能离周（岐周，今扶风、岐山二县交界一带。参见后）地不远，甚或是属于周地范围。不过，借助下述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即可以较好地解决郑桓公的封地位置问题。

2、今本《竹书纪年》：（宣王）二十二年，王锡王子多父，命居洛。……（幽王二年），晋文公同王子多父伐郕，克之，乃居

郑父之丘，是为郑桓公。……八年（前 774 年），王锡司徒郑伯多父命。

古本《竹书纪年》的相关记载作：“（晋文侯）二年（前 779 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郕，克之。乃居郑父之丘，名之曰郑，是为郑桓公。”李峰指出，今本《竹书纪年》由于没有经过引用和复原的复杂过程，较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更为可靠，而古本《竹书纪年》的内容在流传和复原中更容易出现错误，与郑相关的例子是误郕为郕^②。笔者以为，李说是正确的，因为《国语·郑语》中有“申、缙、西戎方强……若伐申，而缙与西戎会以伐周”之文，新公布的清华简《系年》^③中也有“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一句，而缙、曾即郕之异写。认识到今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可靠性，再比较上述《史记·郑世家》与今本《竹书纪年》中关于的郑桓公记载，就会发现今本《竹书纪年》的可信度要强于《史记·郑世家》。例如郑桓公的名字歧异问题就是如此。郑桓公的名字，《郑世家》作“友”，《竹书纪年》作“多父”。从《竹书纪年》今、古本皆作“多父”，以及 1976 年 1 月陕西扶风云塘村西周晚期墓出土的铜器有《伯多父鬲》4 件^④（作器者“伯多父”当即今本《竹书纪年》中“郑伯多父”的略称，也就是郑桓公）来看，《郑世家》作“友”错误。这个脱讹大约是在篆书隶变过程中因“多”、“友”二字篆书字形有时接近（如多可作 𠂔、友可作 𠂔^⑤）所导致。又如郑桓公的始封时间和地点歧异问题也是如此。郑桓公的始封时间和地点，《郑世家》作前 806 年封



①唐兰：《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文物》1976 年 5 期，第 39 页；卢连成：《周都郑考》，《古文字论集（二）》，《考古与文物》编辑部，1983 年，第 8—11 页；尚志儒：《郑、棫林之故地及其源流探讨》，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周文化论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 年，第 272—279 页。

②李峰：《西周金文中的郑地和郑国东迁》，《文物》2006 年第 9 期。

③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二章》，上海：中西书局，2011 年。

④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第 92—94 页。

⑤容庚：《金文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年，第 150、385 页。

郑，今本《竹书纪年》作前 806 年“王锡王子多父命，居洛”、前 780 年（幽王二年）多父克酈后始居“郑父之丘”。显然，《郑世家》把二事混同为一事，是错误的（参见后）。而对于“郑父之丘”名称来历的分析也能够进一步说明今本《竹书纪年》记载所具有的原典性。“郑父之丘”一名最早就出现在《竹书纪年》中，到四世纪后期的前秦时期已开始有人引用^①，由于这个地名颇为奇怪，因而很有讨论的必要。我们知道，西周时期的地名一般为单字或双字两种表现形式，像这样的地名在文献中可谓仅见。考虑到该地为郑桓公的始封地，该地名应当是大地名“郑”和小地名“父之丘”的联称。在周代地名中，某些双字地名间可以加“之”字，如“牧之野”即“牧野”^②、“寝之丘”即“寝丘”^③乃其例。因此，此“父之丘”亦即“父丘”。可是，这个父丘的位置何在？由于其他文献中并无父丘之名，似乎无从考知。其实，父丘就是犬丘之误，这个错误很可能是西晋学者在把《竹书纪年》的先秦篆书进行隶变的过程中误认“犬”作“父”所致。父、犬二字，如楚简字形分别作、，较为接近，如果字迹漫漶，很容易误认。对此，下列关于“械林”的讨论，也能够进一步证实此点。

3、《世本·居篇》：郑桓公封械林。桓公居械林，徙拾。

东汉宋衷释曰：“械林与拾，皆旧地名，封桓公，乃名为郑。”好像“郑”是西周末年才有的一个新地名。显然，宋衷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前录《竹书纪年》、西周中期器《免尊》等铭文中出现的“郑”就否定了这一点。但是，械林在郑犬丘应为无疑，因为“郑桓公封械林”与“晋文公同王子多父伐酈，克之，乃居郑（父）[犬]之丘，是为郑桓公”讲的是一回事。知道了械林的位置，也就知道了郑的所在。因为，械林既是犬丘，犬丘也就是槐里。今本《竹书纪年》说：“（懿王）十五年，王自宗周迁于槐里。”《世本》则说：“懿王徙于犬邱。”班固《汉书·地理志》归纳说：“槐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废丘。高祖三年更名。”尽管班固的说法存在一定错漏^⑤，但指槐里、犬丘为一地是无可疑问的。前录《竹书纪年》称“穆王以下，都于

西郑”，意思当然是说穆、恭、懿、孝、夷、厉、宣、幽等 8 位周王皆以郑为王朝都城，而懿王徙居槐里或犬邱，其实也就是迁居于郑，这正好能够解释穆王以降都郑、都槐里二者看似有些矛盾的记载。顺便说，槐里、械林之所以为一地，当是因为槐里、械林为一名异写。按上古读音，槐从鬼得声，见纽微韵，里为来纽支韵，故槐里可拟音为 $k\dot{i}w\ddot{e}i^2 li\ddot{e}^2$ ；^⑥ 械从或得声，金文或同国，见纽职韵，林为来纽侵韵，故械林可拟音为 $ku\ddot{e}k^4 li\ddot{e}m^1$ 。^⑦ 显然，槐里、械林二名的上古读音甚是接近。械林一名在金文中也有出现。穆王时器《虢簋》铭文云：

唯六月初吉乙酉，（王）在京之师。戎伐□，虢率有司、师氏奔追，御戎于械林，搏戎款”。

这个“械林”之械字原文，左部不从“木”而从“周”，可以呼应《史记·周本纪》所谓郑桓公“和集周民，周民皆说”的记载。顺便说，学者们根据穆王时器《长由盃》有“穆王在下泮居”之文，《元年师事簋》亦有“王在下泮居”之文，周懿王时器《蔡簋》又有“王在泮居”。

①《汉书》卷 28 上《地理志上》京兆尹郑县条颜师古注引臣瓚，亦作“郑父之丘”。臣瓚之言当出自西晋出土的《竹书纪年》。今《汉书》标点者以“郑父”作地名，当误。

②按：《诗经·鲁颂·閟宫》、《战国策·魏策一》等作“牧之野”，《尚书·牧誓》、今本《竹书纪年》等作“牧（埭）野”。

③《吕氏春秋·异宝》云：“楚越之间有寝之丘者。”毕沅注：“《列子·说符篇》、《淮南·人间训》皆作寝丘，无之字。”见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上册），卷 10 第 13b 页。

④分别采自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33 号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湖北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219 号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年。

⑤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卷 3 有曰：“《世本》懿王二年自镐徙都犬丘，《（竹书）纪年》懿王十五年自宗周迁于槐里。是周时已有槐里之名。……据《（汉书）周勃、樊噲传》，汉初有废丘，又有槐里，或其后置县，乃统谓之槐里耳。”

⑥李珍华、周长楫编撰：《汉字古今音表》（修订本），第 67、62 页。

⑦李珍华、周长楫编撰：《汉字古今音表》（修订本），第 402、427 页。

旦，王格庙”之文，而认为其中的“减”、“下减”为一地，且与棫林有关的看法^①，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减”字在《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已有出现。《文王有声》一诗中有云：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

筑城伊减，作丰伊匹，匪棘其欲，逋迨来孝。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王后烝哉。

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皇王烝哉。

毛传云：“减，成（城）沟也。”郑笺云：“方十里曰成，减其沟也，广深各八尺。”孔疏云：“成间有减，字又作‘洫’，《韩诗》云：减，深池。”^②可见，减必定是与城邑有关的水体。该诗显然是歌颂文王功业的，所谓“筑城伊减，作丰伊匹”，意思是指文王既在减水边筑城，又在丰水边作邑。对比前录今本《竹书纪年》之文：“周师取耆及邶，遂伐崇，崇人降”、“西伯自程迁于丰”、“西伯使世子发营镐”，知文王伐崇后的主要功业就是迁丰营镐，因此，“筑城伊减”更准确的意思就是指在减水边修筑镐京。我们知道，镐京边有酈池、酈水，而酈水又名沔水^③。按上古减可二读，一是减从或得声，金文或同国，见纽职韵，可拟音 kuək⁴，而酈，从高得声，见纽宵韵，可拟音 kau¹，二字读音较近。一是减同洫，从血得声，晓纽质韵，可拟音 hi-wet⁴，而沔，从穴得声，匣纽质韵，可拟音 xiwet⁴，^④二字读音同样接近。因此，周王的“减居”、“下减居”应该是在镐京或其附近的减水边。“王在×居”（居或释作“应”）的句式，在金文中有数见，杨树达认为×居“犹言某都也”^⑤，惜其说并无依据，不取。笔者以为“王在×居”之“居”，大约相当于周王的别墅，其建筑地点可以肯定都在主要都城或其附近的环境幽雅之处。另如《师虎簋》有云：“王在杜居，格于大室。”意思是说周王来到杜居大室，而杜居自然在杜，杜在今西安南郊河谷，本是离宗周不远的。

知道了郑、槐里、棫林、犬丘为一地，那么，其具体位置就很容易确定。《水经注·渭水》

有云：

渭水又东径槐里县故城南。县，古犬丘邑也，周懿王都之。秦以为废丘，亦曰舒丘。中平元年，灵帝封左中郎将皇甫嵩为侯国。县南对渭水，北背通渠。……后项羽入秦，封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董翳为翟王，都高奴；章邯为雍王，都废丘，为三秦。汉祖北定三秦，引水灌城，遂灭章邯。三年，改曰槐里。王莽更名槐治也，世谓之为大槐里。晋太康中，始平郡治也。其城递带防陆，旧渠尚存，即《汉书》所谓“槐里环堤”者也。

始平，到唐代改名兴平，也就是今陕西兴平。元《类编长安志》云：“槐里故城一名犬丘城，在兴平县东南一十里，周十二里，崇二丈五尺。”^⑥今在兴平东南，该位置发现有南佐村遗址，该遗址地面平坦开阔，采集标本以砖、半瓦当较多，有绳纹板瓦和筒瓦残片；遗址区西南念流寨村曾出土金饼。^⑦大约是由于在该遗址地表没有发现西周遗物，有的学者认为该遗址为秦代建筑遗址，不是西周遗址。其实，由该遗址清晰的历史线索，即可知该遗址为西周槐里（犬丘）遗址无疑。之所以至今没有在遗址上发现西周遗物，一是因为汉祖北定三秦攻章邯时引水灌城而被泥沙较深掩埋所致，二是因为考古工作者从来没有在遗址上作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假以时日，笔者以为该地必定当有西周遗物发现。顺便说，周穆王时之所以选择建新都于郑（槐里、犬丘），可能与该地靠近河湖、林木广阔、能猎能

①唐兰：《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唐复年：《师事簋新释》，《古文字论集（二）》，《考古与文物》编辑部，1983年，第30—35页；卢连成：《周都减郑考》；尚志儒：《郑、棫林之故地及其源流探讨》。

②《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1050页。

③《水经注》卷19《渭水》。

④上拟音参见李珍华、周长楫编撰：《汉字古今音表》（修订本），第275、400、256页。

⑤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9页。

⑥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226页。

⑦咸阳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编：《咸阳市文物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牧的良好自然环境条件有重要关系，因为众所周知周穆王本人喜游玩，而周王室贵族也多爱好游猎。首先，穆王时器《免簠》提到郑有“林”、“虞”、“牧”的存在：

唯三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命免作司土（徒）司郑，及林及虞及牧^①。

周代“司土（徒）”是管理土地、人民的官员，可见在郑成为都城后，司土（徒）可能成为郑最重要的官员之一，以致幽王时其弟多父（郑桓公）被封为“郑伯”后不久，又被赐以司徒职务（参见后）。其次，当时郑的附近有较大的湖泊水体存在。《元和郡县图志》有云：

马牧泽，在（兴平）县东南二十里，南北广四里，东西二十一里。^②

既然唐代尚有马牧泽，唐以前千数百年的西周时期该泽面积应该更为广阔。这样，该泽的位置离在“兴平县东南一十里”的槐里故城就很近。其三，郑（槐里、犬丘）城当时就在渭河北岸水滨（今犬丘故城南距渭河北岸约3.3公里，说明该段渭河河道近3000年来已大幅南迁）。这样，如前录，汉时刘邦才能“引（渭）水灌城”而灭章邯。可见，在镐京辟雍已经基本淤塞的情况下，郑显然具有接替其作为王室贵族居住、游赏、渔猎之地的自然环境条件。例如，西周中晚期器铭中发现有“郑井叔”（《郑井叔鬲》等）、“郑羌（姜）伯”（《郑羌伯鬲》、《郑姜伯鼎》）、“郑（城）虢仲”（《郑虢仲簋》、《城虢仲簋》）、“郑义伯”（《郑义伯鬲》）、“郑邓伯”（《郑邓伯鬲》）等人名，显然，井叔、羌（姜）伯、虢仲、义伯、邓伯等都应该是常年寄居于新都郑的贵族。又如，史有载穆王十四年“夏四月，王畋于军丘；……冬，蒐于萍泽”^③，即是说穆王在军丘、萍泽狩猎。军为见纽文部，犬为溪纽元部，上古读音较近，疑“军丘”即犬丘之异写；萍泽，或为唐马牧泽的前身。到后来的汉代，位于渭北的这一带甚至仍然被包括在上林苑的范围，即前录《三辅黄图》引《汉书》所谓上林苑“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水而东”。长杨、五柞、黄山皆离宫名，而黄山宫明确是在汉槐里县境内的^④。（参见图4）

械林（犬丘）性质和位置的确定，一是对于正确理解郑国的建国过程很有帮助。过去，学者

们依据《史记·郑世家》的说法以宣王22年（前806年）作为郑国的立国时间，现在看来，依据今本《竹书纪年》，该年只是“王锡王子多父命，居洛”，洛即洛邑成周，属“东土”。郑作为采邑赏给多父的时间应是幽王二年即前780年，如前录，该年“晋文公同王子多父伐鄆，克之，乃居郑（父）[犬]之丘，是为郑桓公”。郑桓公自是郑人后来追谥，实际上应是因多父的伐鄆之功，幽王把郑作为采邑赏赐给其弟多父，多父从此改爵称“郑伯”。也就是说，幽王是把周都城郑作为赏赐给郑伯多父的采邑。这种把都城所在地作为采邑赏赐给重臣的情况周初就有周公、毕（辟）公、丰侯等，周公的采邑即周，毕（辟）公的采邑当即镐，丰侯的采邑当即丰。六年后的前774年，郑伯多父又被任命为司徒，说明多父受到周幽王的特别器重。由于西周末年的幽王时期时局动荡，多父为了保护郑地的人民和亲眷不受战争袭扰，听从史伯的意见，于前773年将周都郑的人民和亲眷东迁到“虢、（郕）[鄆]之间”“寄孥”，即依附王太子宜臼（周平王）所在的申（即拾，当今华县东北的古郑

①按：“命免作司土（徒）司郑，及林及虞及牧”句，学者原多读作“命免作司土（徒）司郑苑（或作县）林，及虞及牧”。即以郑字后“𡗗（還）”字作苑或县。前已释“還”即“及”字，而前录《同簋》有谓“王命同佐佑吴大父，司场林、虞、牧”一句，故知《免簠》此句必当读“及林及虞及牧”为句。

②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1《关内道二·京兆下·兴平县》，（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页。

③今本《竹书纪年》卷下《穆王》。

④《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槐里县”条。

城^①地建立郑国。^②所谓寄孥，有些类似于后世的寄籍、借居。大约由于鸠汇款占鹊巢，“申”的名称东周以降也就被“郑”所取代，而原来的周都郑则被称为“棫林”。前 771 年由于郑伯多父与幽王一同被杀于骊山下，迁居于虢、郾之间的郑人于是拥立多父之子袭位，是为“郑子”（即郑武公）。同年，郑子（武公）等人即在申（郑）地拥立宜臼为周平王；次年（前 770 年），又与晋、卫、秦等国国君一起护送周平王东徙洛邑成周。到周平王六年（前 765 年），郑武公才把郑人再迁于新的“溱洧”之地，也就是今河南中部新郑一带。^③二是对于理解其他文献中关于“棫林”的记载也很有帮助。例如《左传·襄公十四年》有云：

夏，诸侯之大夫从晋侯伐秦，以报栎之役也。晋侯待于竟，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济泾而次。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郑司马子蟜师郑师以进，师皆从之，至于棫林，不获成焉。

所谓“至于棫林，不获成焉”的含义，一直不好理解，传统说法是晋与秦没有和解成功，或没有弄成战阵之事^④。这样的解释显然十分勉强。按“成”可通“城”，而从《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来看，丰、镐似皆有城垣，郑（棫林）作为西周穆王的新建都城，应该也是修筑有城墙的。因而，“不获成焉”的含义，很可能就是指晋军没有攻下棫林城。

四 周与岐周

丰既然是宗周，那么，金文中多见的“周”是不是像有的学者所说的也可指“宗周”？应该说，仅从《史记·鲁周公世家》有“（成）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一句，就可以判断周不是宗周（丰），也不是成周（雒）。这样一来，周只能是指岐（下），即俗称的岐周，旧所谓“周城”，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岐山之阳的周原地方^⑤。因此，过去有学者认为周为镐京、宗周乃至成周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应该说，整个西周时期，岐周确实表现出它在周王朝祭祀、政治、军事活动中的极端重要性。为了证明《史记·鲁周公世家》所言不误，我们不妨把金

文中关于“周”地记载的主要内容整理彙录如下。

（一）西周早期（武、成、康、昭、穆王）器铭

1、《周公东征鼎》：唯周公东征，伐东夷，丰伯、薄姑咸伐。公归，荐于周庙。戊辰，饮秦饮。公赏鬯贝百朋。用作尊鼎。

2、《史墙盘》^⑥：粤武王既厥殷，微史烈祖乃来见武王，武王则命周公舍宇于周，

①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 54《陕西三》引明《（陕西）通志》有云：“古郑城在（华）州东北二十五里，郑始封邑也”。《世本》所谓拾，即是汉晋间的郑县县治、明《（陕西）通志》所谓华州（今华县）古郑城。至于《竹书纪年》之“申”（西申），与《世本》之“拾”亦为一地，这当是因为拾、申二字上古读音近同（拾，声部禅纽；申，声部书纽，皆为舌上擦音，发音部位近同），可以通假。郑桓公徙拾，即是徙申，也就是徙于王太子宜臼（周平王）因母亲失宠而出奔的申。申国本是宜臼母亲的娘家。申（西申）地并不在今学术界所普遍认同的今陕西眉县，与眉县有联系的是申伯国。

②今本《竹书纪年》云：“（幽王）五年（前 777 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清华简《系年》亦云：“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又）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知郑人东迁申（即拾）地之前，宜臼已在申。《史记·郑世家》云：“而虢、（郅）〔郾〕果献十邑，竟国之。”可见郑国建立的准确时间应为前 773 年。虢在今河南三门峡市一带无疑，而郾的位置自然离申（郑）国不远。按《水经注·渭水》有云：“渭水又东与东石桥水会，故沈水也。……石桥水又径郑城东，……又北径沈阳城北，注于渭。”沈、溱、澮古音近同。所谓“沈阳城”可能就是西周曾国的所在，位置约在陕西华阴的渭河南岸一带。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曾国会与中国一道成为伐灭西周的主力，原来申、曾二国确有唇齿关系。对此，笔者有另文专论，不赘。

③关于郑国东迁的过程，笔者另有文论证，此不赘。

④《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第 920 页。

⑤关于周城的具体位置，传统说法略有异。《汉书·地理志》右扶风“美阳”条云：“中水乡，周大王所邑。”《水经注·渭水》云：“（周）城在岐山之阳而近西，所谓居岐之阳也。”《括地志》云：“故周城，一名美阳城，在雍州武功县西北二十五里，即太王城也。”参据今天的考古发现情况，周城的具体位置应该在以凤雏、召陈西周宫殿遗址为中心的岐山、扶风二县交界一带。参见后。

⑥《史墙盘》为西周中期恭王时器，因此引内容涉武王事迹而置此。

卑处甬。

3、《保员簋》：“唯王既燎，厥伐东夷，在十又一月，辟公返自周。

4、《保卣》：乙卯，王命保及殷东国五侯，诞赐六品，蔑历于保，赐宾。……邁于四方，会大祀，祓于周，在二月既望。

5、《小孟鼎》：唯八月既望，辰在甲申。昧爽，三左三右，多君入。明，王格周庙。……西旅□□入，燎周□。……大采三周，入服酒。……用牲，禘周王、[武]王、成王……。

6、《守宫盘》：唯正月既生霸乙未，王在周。周师光守宫事裸，周师不罔。

7、《柞伯簋》：唯八月辰在庚申，王大射，在周。

8、《应侯见工钟》：“唯正月初吉，王归自成周，应侯见工遗王于周。”

9、《高卣》：唯十又二月，王初裸旁，唯还在周；辰在庚申，王饮西宫。

10、《虎簋盖》：唯卅年四月初吉甲戌，王在周新宫，格于大室，密叔入佑虎，即位。

11、《卫簋》：唯八月既生霸庚寅，王格于康大室。卫曰：朕光尹仲侃父佑，告卫于王。

从这些材料看，西周早期在周的建筑物主要有周庙、康大室、新宫、西宫等，周王在周的活动，除了常见的册命活动（参见后），尚有祭祀、饮酒、射猎活动。如荐（《周公东征鼎》）、祓（《保卣》）、燎（祭）（《小孟鼎》）之类，即属于祭祀活动。荐乃祭祖，祓乃祈福（《说文》：“祓，除恶祭也。”），燎乃祭天（《说文》：“柴，烧柴焚祭以祭天神。”）。“饮秦饮”、“服酒”、“裸”、“饮西宫”之类自然属于饮酒活动，“大射”（《柞伯簋》^①）则属于射猎活动。

（二）西周中期（恭、懿、孝、夷王）器铭

1、《二式狱簋》：唯十又一月既望丁亥，王格于康大室。狱曰：朕光尹周师佑，告狝于王。

2、《狱盘》：唯四月初吉丁亥，王格于师禹父宫。狱曰：朕光尹周师佑，告狝于王。

3、《庚嬴鼎》：唯廿又二年四月既望己酉，王格周宫，卒事。

4、《师汤父鼎》：唯十又二月初吉丙午，王在周新宫，在射庐。

5、《七年赵曹鼎》：唯七年十月既生霸，王在周般宫。旦，王格大室，并伯入佑赵曹，立中廷，北向。

6、《十五年赵曹鼎》：唯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恭王在周新宫，王射于射庐。

7、《士山盘》：唯王十又六年九月既生霸甲申，王在周新宫。王格大室，即位，士山入门，立中廷，北向。

8、《师晨鼎》：唯三年三月初吉甲戌，王在周师录宫。

9、《九年卫鼎》：唯九年正月既死霸庚辰，王在周驹宫，格庙，眉敖、诸肤卓事见于王。

10、《留鼎》：唯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在周穆王大（室）。……王在□（杜）居。

11、《留壶盖》：唯正月初吉丁亥，王格于成宫。并公入佑留，王呼尹氏册命留曰：更乃祖考作冢司土（徒）于成周八师，赐汝柎鬯一卣、玄衮衣、赤市、幽黄、赤舄、鎡勒、鎡旂。用事。

12、《免簋》：唯十又二月初吉，王在周。昧爽，王格于大庙，并叔佑免即位。

13、《敌簋》：唯四月初吉丁亥，王在周，格于大室。

14、《穆公簋盖》：唯王初如□，乃自商师复还至于周，王夕飧醴于大室。

15、《师遽簋盖》：唯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王在周，格新宫。

16、《大师虢簋》：正月既望甲午，[王]在周师量宫。旦，王格大室。

17、《廿七年卫簋》：唯廿又七年三月既生霸戊戌，王在周，格大室，即位。

18、《申簋盖》：唯正月初吉丁卯，王在周康宫，格大室，即位。益公入佑申，立中

①按：《柞伯簋》的时代，学者多认为或在康、昭、穆时代，笔者以为可能在此前的成王时代，因为，《左传》昭公四年所载成王的重要功业“岐阳之蒐”，似就是指此之周地的“大射”活动。

廷，王命尹册命申：“康乃祖考丕大祝，官司丰人及九□祝”。

19、《望簋》：唯王十又三年六月初吉戊戌，王在周康宫新宫。旦，王格大室。……王呼史年册命望：“死司毕王家。”

20、《师鬲簋盖》：唯二月初吉戊寅，王在周师司马宫，格大室。

21、《牧簋》：唯王七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王在周，在师汙父宫，格大室，即位，公族县入佑牧，立中廷，王呼内史吴册命牧。

22、《癸簋》：唯四年二月既生霸戊戌，王在周师录宫，格大室，即位，司马共佑癸。

23、《盂方尊》：唯八月初吉，王格于周庙，穆公佑盂立中廷，北向。王册命尹赐盂赤市、幽亢、攸勒，日用司六师。王行三有司司徒、司马、司空，王命盂曰：勗司六师及八师，艺。盂拜稽首。

24、《趯觶》：唯三月初吉乙卯，王在周，格大室，咸井叔入佑趯。

25、《师遽方彝》：唯正月既生霸丁酉，王在周康寝，飨醴，师遽蔑历侑。

26、《吴方彝盖》：唯二月初吉丁亥，王在周成大室。旦，王格庙，宰肸佑作册吴入门，立中廷，北向。

27、《达盨盖》：唯三年五月既生霸壬寅，王在周，执驹于漏居。

28、《走马休盘》：唯廿年正月既望甲戌，王在周康宫。旦，王格大室，即位，益公佑走马休入门，立中廷，北向。

29、《宰兽簋》：唯六年二月初吉甲戌，王在周师录宫。旦，王格大室，即位。司士（徒）荣伯佑宰兽入门，立中廷，北向。王呼内史尹仲册命宰兽曰：“昔先王既命汝，今余唯或申京乃命，康乃祖考事，司康宫王家臣妾仆佣外内，毋敢无闻知。”

30、《殷簋》：唯王二月既生霸丁丑，王在周新宫。王格大室，即位，士戌佑殷立中廷，北向。王呼内史言命殷，赐市、朱黄。王若曰：“殷，命汝康乃祖考友，司东鄙五邑。”

显然，与前期相比，西周中期周王的主要活动内容即册命官员贵族并无改变，但活动场所除了先君宗庙、宫室，最有特色的变化是出现了属于“周师”系统的录宫、量宫、汙父宫、禹父宫、司马宫等。

（三）西周晚期（厉、宣、幽王）器铭

1、《克钟》：唯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康刺（厉）宫。王呼士智召克，王亲命：克，遯涇，东至于京师。

2、《无斿鼎》：唯九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庙，述于图室，司徒南仲佑许惠入门，立中廷，王呼史参册命许惠。

3、《趯鼎》：唯十又九年四月既望辛卯，王在周康昭宫，格于大室，即位，宰讯佑趯入门，立中廷，北向，史留受王命书。

4、《鬲攸比鼎》：唯卅又二年三月初吉壬辰，王在周康宫夷大室。

5、《此鼎》：唯十又七年十又二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康宫夷宫。旦，王格大室。

6、《膳夫山鼎》：唯卅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王在周，格图室。南宫乎入佑膳夫山入门，立中廷，北向，王呼史荣册命山。

7、《走簋》：唯王十又二年三月既望庚寅，王在周，格大室，即位。司马井伯[入]佑走。

8、《楚簋》：唯正月初吉丁亥，王格于康宫，仲棚父入佑楚。

9、《元年师兑簋》：唯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在周，格康庙，即位，同仲佑师兑入门，立中廷。

10、《谏簋》：唯五年三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师录宫。旦，王格大室。

11、《辅师鬲簋》：唯王九月既生霸甲寅，王在周康宫，格大室，即位，荣伯入佑辅师鬲。

12、《伊簋》：唯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王在周康宫。旦，王格穆大室，即位，申季入佑伊，立中廷，北向。王呼命尹封，册命伊勗官，司康宫王臣妾百工。

13、《寰鼎》：唯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宫。旦，王格大室，即位。

14、《扬簋》：唯九月既生霸庚寅，王在

周康宫。旦，格大室，即位，司徒单伯入佑扬。

15、《鬯簋盖》：唯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昭宫。酈丁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入门，立中廷，佑祝。

16、《师颍簋》：唯王元年九月既望丁亥，王在周康宫。旦，王格大室。司工（空）液伯入佑师颍，立中廷，北向。

17、《三年师兑簋》：唯三年二月初吉丁亥，王在周，格大庙，即位，醴伯佑师兑入门，立中廷。

18、《师斿簋》：唯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王在周，格于大室，即位，宰珣生入佑师斿。

19、《颂簋》：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昭宫。旦，王格大室，即位，宰引佑颂入门，立中廷，尹氏受王命书，王呼史虢生册命颂。

20、《膳夫克盥》：唯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康穆宫。

21、《吴虎鼎》：唯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宫夷宫，……申厉王命。

22、《虢季子白盘》：唯十又三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宝盘。丕显子白，将武于戎功；径维四方，搏伐殄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献职于王。王孔嘉子白义，王格周庙，宣榭爰飨。

由上可见，西周晚期周王在周的活动性质基本上属于册命，活动地点主要是在“康（×）宫”、“大室”、“周庙”，而前述“周师”系统宫室、官员的作用明显弱化。这似乎可以反映康（×）宫、大室这样的建筑在此间周地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综合上述三部分文字，可见周王在周地的活动早、中、晚期都有，这似乎可以说明西周中晚期周（岐周）在周王朝的政治、祭祀、军事活动中具有最为重要的作用。应该说，周地作为西周时期的都城，相比丰、镐、郑、成周等，确实表现出两大特征。特征之一，是祭祀、政治、军事活动的场所最多。一是有“大庙”，如《免簋》、

《三年师兑簋》所言。大庙可能就是《周公东征鼎》、《无夷鼎》、《盠方尊》、《虢季子白盘》、《小孟鼎》中的“周庙”、《庚嬴鼎》中的“周宫”。晚期大庙中还有“图室”（《无夷鼎》、《膳夫山鼎》），可能是陈列先王画像的房间；有“康庙”，如《元年师兑簋》；康庙应就是下述“康宫”的异名。二是有“大室”，如《敌簋》、《穆公簋盖》、《走簋》、《廿七年卫簋》、《师斿簋》、《趯觶》等所言。大室就是传世文献中的“太室”^①、“京室”^②、“京太室”^③。西汉孔安国曰：“太室，清庙。”东汉王肃曰：“太室，清庙中央之室。”^④意思是说，太室就是太庙，或太庙建筑（群）中居于中心位置的部分。1974年岐山凤雏村发现的始建于殷末先周时期、沿用至西周晚期的甲组宫殿建筑^⑤，其中央主体为一大殿（前堂），面积达105m²^⑥。该大殿建筑东西各有厢房，按《尔雅·释宫》谓“室有东西厢曰庙”，则该建筑群亦可称“庙”（图2^⑦），而建筑群的中央之室应就是“周大室”。周大室当就是周庙大室的略称，或周庙的异称。东汉蔡邕《明堂论》就曾指出周庙、太庙、太室、京太室为一。^⑧这样看来，周地的所谓“大庙”、“周庙”、“周宫”、“大室”、“京室”、“京大室”等当是指的同一处建筑（群），只是由于不同时代或不同地方的人们对此

①《尚书·洛诰》有云：“王入太室裸。”

②《诗经·大雅·思齐》有云：“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周姜，周文王祖母。京，大也。

③《吕氏春秋·古乐》有云：“周文王处岐，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京太室”当为后世秦人对周“京室”、“太室”的合并性称呼。

④《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419、420页引。

⑤徐锡台：《周原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王恩田：《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群基址的有关问题》，《文物》1981年第1期；杨鸿勋：《西周岐邑建筑遗址初步考察》，《文物》1981年第3期；杜金鹏：《周原宫殿建筑类型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学报》2009年第4期。

⑥陈全方、陈敏：《周原》，第46—65页。

⑦据杜金鹏《周原宫殿建筑类型及相关问题探讨》文附图，略作改注。

⑧《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后汉》卷80《蔡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41—742页。

而有不同的称呼。三是有“成大室”，如《吴方彝盖》铭文。这应是指祭祀周成王宗庙的大室，也就是成庙。《智壶盖》铭中有所谓“成宫”，亦当其指。四是有“新宫”，如《虎簋盖》、《师汤父鼎》、《十五年趯曹鼎》、《士山盘》等。“新宫”大约建于穆王时，现存最早出现“新宫”一名的《虎簋盖》即为穆王时器。新宫可能是一个小型建筑群，因为除了必备的“大室”外，还有叫做“射庐”的建筑，射庐自是练习射术的独立性房舍（《十五年趯曹鼎》），但同样可以进行娱乐活动。如懿王时器《匡卣》铭曰：“唯四月初吉甲午，懿王在射庐作象舞，匡卣象乐二。”这个新宫与下述“康宫”建筑群中作为宗庙的“新宫”似不是一回事。五是有“康宫”建筑群，如《此鼎》、《申簋盖》、《辅师鬲簋》、《伊簋》、《师潁簋》、《走马休盘》等所言。康宫在周康王死后建成使用，为祭祀周康王的宗庙^①，也可叫“康大室”。“康宫”建筑群中显然又包括有“昭宫”（《趯鼎》、《颂簋》、《酈簋盖》）、“穆宫”（《哀鼎》、《膳夫克盨》）、“新宫”（《望簋》）、“夷宫”（《此鼎》）、“厉宫”（《克钟》）、“宣榭”（《酈簋盖》、《虢季子白盘》）、“寝”等名目。昭、穆、新、夷、厉诸宫中都含有“大室”，如《颂簋》所谓“王在周康昭宫。旦，王格大室”；以此，诸宫似也可别名为“×大室”，如《鬲攸比鼎》谓“王在周康宫夷大室”、《伊簋》谓“王格穆大室”；“宣榭”，后来春秋时期的成周亦有，左氏释为讲武屋^②。可能由于康宫建筑群的庞大，以至于先安排有专人“司康宫王家臣妾仆佣外内”（《宰兽簋》），后又设置有专“司康宫王臣妾百工”的鬲官（《伊簋》）。而从金文对康宫的多次提及，可以推测康宫应是周地十分重要的宫室群，尤其在西周中晚期。今天，在周原扶风县召陈发现的西周建筑群，已揭露出建筑基址15座，其中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的平面布局均为纵向分隔的三部分，中间是堂，两侧为厢夹（如图3^③，注意其中的F3、F5、F8号建筑基址），研究者认为该建筑群上层建筑始建于西周中期，废弃于西周晚期，为西周宫室建筑无疑，部分建筑应属与西周政治、宗教有关的礼仪建筑。^④ 笔者以为，召陈发现的西周宫室建筑主体很可能就是康宫建筑群。因为，从时间上看，康宫建筑群主体

无疑是在昭王及其以后时代才修建的，这与召陈建筑群属于西周中期基本符合；从建筑结构来说，金文所反映的康宫等存在“大室”的情况，与召陈建筑群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中间均为大堂的形式亦相符合（参见图3）。六是有“周师”宫室群，包括“录宫”（《师晨鼎》、《谏簋》、《癸盨》）、“量宫”（《大师虞簋》）、“司徒宫”（《师潁簋盖》）、“汙父宫”（《牧簋》）、“禹父宫”（《猷盘》）等。所谓“周师”，从《猷盘》有“猷曰：朕光尹周师右，告猷于王”（大意是：我很荣幸有周师护佑，来向大王汇报）一句来看，当是指周王的禁卫军，也就是指众所周知的“周六师”或“西六师”之部。这似可说明，西周中期岐周的军事力量已经增强，而周王对“周师”的依赖性同样增强。这可能是由于西周中期懿王时西戎、翟人相继侵扰镐京、岐周^⑤的缘故。顺便说，金文中多见的某些建筑物名前置“周师”或“师”字，应是该建筑物具有军方性质或军事用途的标志，如录宫、量宫、汙父宫、禹父宫、戏

①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按：康宫问题经历数十年的论辩，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学者关于康宫性质的讨论，有死人宗庙与生人宫室二说，而宗庙说又有王室宗庙与康王之庙的区别，宫室说则有时王所居之宫与王储所居之宫的不同。笔者大体赞成死人宗庙说。因为，今本《竹书纪年》中有这样两条重要记载：“（穆王）元年己未春正月，王即位。作昭宫。”“（厉王）元年戊申春正月，王即位。作夷宫。”可以呼应金文内容。这是说穆王、厉王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分别为刚刚故去的昭王、夷王建造昭宫、夷宫。可见，昭宫、夷宫是死人宗庙无疑。康宫虽出现在昭宫、夷宫之前，但性质上应该一样，即当是周昭王为故去的康王所建宗庙。不过，周人以祭祀为先，作为宗庙的康宫等，其“大室”的主要用途当在于祭祀，而两侧的厢夹并不妨碍其作为生人宫室的居住用途（参见图3）。

②《左传·宣公十六年》。

③据杜金鹏《周原宫殿建筑类型及相关问题探讨》文附图。

④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召陈西周建筑群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3期；杜金鹏：《周原宫殿建筑类型及相关问题探讨》。另外，杨鸿勋认为召陈建筑为当时的高级设置（杨鸿勋：《西周岐邑建筑遗址初步考察》，《文物》1981年第3期），傅熹年以为遗址的性质待定（傅熹年：《陕西扶风召陈建筑遗址初探》，《文物》1981年第3期）。

⑤今本《竹书纪年》有云：“（懿王）七年，西戎侵镐。十三年，翟人侵岐。”可证。

Architectural floor plan of the Han Dynasty site at Zhongyuan, Zhengzhou. The plan shows a large central courtyard (大庭) surrounded by various rooms and corridors. Key features include the '大室' (Great Hall) at the top, '西厢' (West Wing) on the left, and '东厢' (East Wing) on the right. Numerous smaller rooms, corridors, and courtyards are labeled with numbers and Chinese characters. A scale bar at the bottom indicates 10 meters.

特征之二，是政治、军事性活动最为频繁。这些政治、军事性活动主要是册命诸侯、官员、贵族、将领。册命是西周时期的重要制度，内容包括继承王位、分封诸侯、任命官职、赏赐臣下、诰诫臣下、指挥将帅等。西周时代，周（岐、岐周、岐下）、宗周（丰）、成周（雒、雒邑、新邑、大邑、新大邑、新邑洛、洛）^①、镐

城邑	周	宗周	成周	镐京	郑	扈
册命活动（次）	65	28	17	20	3	4

通过把上述所录金文中有关周王在周进行册命活动的情况与在镐京、宗周进行册命活动的情况简单比较,很容易发现周不可能指镐京,也不

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1-6卷),刘雨、卢岩编著:《近出殷周金文集录》(第1-4册),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一)》(第403-405页)等相关材料统计。

可能指宗周。那么，周有没有可能指成周？我们不妨再看看金文中关于周王在成周进行活动的具体地点记载。

1. 《何尊》：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

2. 《周甲戌方鼎》：唯四月，在成周。丙戌，王在京宗，赏在安□□□贝……”

3. 《静方鼎》：唯七月甲子，王在宗周，命师中及静省南国……；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

4. 《十三年癸壶》：唯十又三年九月初吉戊寅，王在成周司土漉宫，格大室，即位。

5. 《十月敌簋》：唯王十月，王在成周。……唯王十又一月，王格于成周大庙。

6. 《晋侯苏编钟》：唯王卅又三年，王亲适省东国、南国。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二月既望癸卯，王入格成周。……王唯返，归在成周公族整师宫。六月初吉戊寅，旦，王格大室，即位。

7. 《令彝》：唯八月，辰在甲申，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令矢告于周公宫，公令出同卿事寮。唯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出令，舍三事令，及卿事寮、及里君、及百工、及诸侯侯田男，舍四方令。既咸令，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宫；乙酉，用牲于康宫。咸既，用牲于王。明公归自王。

由上可见，周王在成周的活动地点包括“京室”、“京宗”、“京宫”、“大室”、“大庙”、“康宫”、“王（宫）”^①、“周公宫”、“司土漉宫”、“公族整师宫”等名目。与前述周地类似，“京室”、“京宗”、“京宫”、“大室”、“大庙”应该也是不同时期不同人士对同一建筑成周大庙的不同称呼。比如，《何尊》所谓的“京室”，无疑就是《周甲戌方鼎》的“京宗”。“大庙”即太庙，作为安放周先君神位的建筑物，除了周、成周二地有，前述镐京、宗周、郑也有。至于“康宫”、“周公宫”，自是祭祀周康王、周公的宗庙。显然，如果把西周时期成周与周地的建筑物名目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二地除了皆有太庙、康宫

（庙）之外，其他的建筑物配置并不相同：成周仅有周公宫、司土（徒）漉宫、公族整师宫等，而周地则有昭宫、穆宫、新宫、夷宫、厉宫诸先王庙以及包括录宫、量宫、司徒宫、汙父宫、再父宫等建筑在内的“周师”宫室群。

从金文记载看，西周时期的诸王，除了武王、宣王、幽王三人，在周地似乎都有宗庙，或是独立设置，如成宫；或是集合设置，如康宫。康、穆二王在周地之外还另有宗庙。康王时期成就了“酆宫之朝”的大业，天下安宁，国力强盛，这可能是在周地之外的成周（洛邑）别立宗庙祭祀康王的原因。至于周穆王，通过“涂山之会”，大合诸侯，“刑帅宇诰”（《史墙盘》），其功业也是可以比肩康王的，这可能是周人在岐周之外的宗周（丰邑）别立宗庙祭祀穆王的原因。“司土漉宫”无疑属于名叫漉的司徒的住所或官署，“公族整师宫”则当是指在成周八师任职的名叫整的周王同族兄弟住所。

根据上录金文资料及其讨论，辅之以传世文献、简帛资料，可以把西周时代各都城可考宗庙的基本情况表列如下：

可见，上面提到的周与成周、宗周、镐京、郑，作为西周时期周王祭祀、政治、军事活动的主要地点，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西周都城的全部或部分功能，应当在西周时期具有独特的地位。西周穆王以降的金文中出现过多次专以“五邑”为名的职官，如“五邑走马御人”（《虎簋盖》，穆王时器）、“五邑走马”（《元年师兑簋》，西周晚期器）、“五邑甸人”（《柞钟》，西周晚期器）、“五邑守堰”（《救簋》，西周晚期器）、“五邑祝”（《毛伯敦》，西周晚期器）等，然其“五邑”所指为何一直不得而知。笔者以为，从周与成周、宗周、镐京、郑五都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以及五都格局实际形成于穆王以降的西周中晚期来看，“五邑”很可能就是指此五都（邑）。在西周五都（邑）中，毫无疑问，周是设施最为完备，功能最为齐全，地位最为突出，延续时间最为持久的祭祀、政治、军事中心，应为西周王朝的首都。传世文献中之所以没有特别提及周人以

①按：《令彝》铭文中的两处“王”字，当指王宫，即周王在成周的住处或行宫，非指西周之后才有的“王城”。见朱凤瀚：《〈召诰〉、〈洛诰〉、何尊与成周》。

周为都，当是因为初时周部落迁居岐下建立的“小邦”（《尚书·大诰》：“兴我小邦周。”），地狭人少，而邦即国，国即城（如《周礼·考工记·匠人》：“国中九经九纬”，郑注：“国中，城内也”^①），城即都（《左传·庄公二十八年》：“都曰城。”），无需专门说明所致：周人都名周，与虢人都名虢、郑人都名郑等一样，为时人所周知。

表 2 西周都城宗庙情况一览

序号	庙名（异称）	祭祀对象	建置地点	备注
1	大庙（周庙、大室、京室、京大室、天室）	周先君	周	“天室”，见《逸周书·世俘解》
2	大庙（酆宫、丰宫）	周先君	宗周	
3	大庙（大室、京室、京宫、京宗）	周先君	成周	
4	大室（蒿室、蒿宫、葵宫）	周先君	镐京	
5	大室	周先君	郑	
6	文大室	周文王	周	见清华简《耆夜》 ^①
7	成宫（成大室）	周成王	周	
8	康宫（康大室、康庙）	周康王	周	
9	康宫		成周	
10	昭宫	周昭王	周	属康宫系统
11	穆宫（穆大室、穆王大室）	周康王	周	属康宫系统
12	穆庙		宗周	
13	新宫	周恭王、周懿王（？）、周孝王（？）	周	属康宫系统
14	夷宫（夷大室）	周夷王	周	属康宫系统
15	剌（厉）宫	周厉王	周	属康宫系统

注：①清华简《耆夜》（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有云：“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耆即黎。此即《尚书·西伯戡黎》所记事，在今本《竹书纪年》中则记作：“（帝辛）四十四年，西伯伐伐黎。”商帝辛四十四年相当于周武王四年。无论是武王四年还是八年，皆在灭商的牧野之战前。以此，文大室的地点当在岐周无疑。

汉以降，人们常把王朝首都称为“京师”，并追根溯源到西周文献中出现的京师称呼。那么，京师是不是西周时期的都城别称？回答是否定的。众所周知，西汉成书的《春秋公羊传》中有一个关于京师的著名解释：“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应该说，这样的解释可能已受到西汉时的流行理解^②影响，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因为，所言“师者何？众也”的解释显然为“师”的引申义，而不是“师”的本义。师的本义或早期含义是指军队，或与军队相关。《说文》云：“师，二千五百人为师。”因此，京师的本义或早期含义当是大军的意思，而不是大众的意思。西周时期的王朝大军自然就是众所周知的“周六师”（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或略称“周师”、“王师”。以此，京师实际上应就是“王师”、“周师”或“周六师”（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的别称。大约由于西周时王朝大军常常驻扎于重要都邑或其附近，而至东周时王师仅限于驻扎在王城洛邑附近^③，故东周以降京师也就慢慢演变成对王朝都城的别称。也就是说，西周时代的京师，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名，而是王朝军队的通称，其含义与周师、王师等同。明白了这一点，对于我们确定西周时期有关材料中“京师”的指称对象很有意义。在传世文献和出土金文、简牍文中，属于西周及其以前的“京师”，大约有如下几处，试为释证。

（1）《诗经·大雅·公刘》中的“京师”：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溇原；乃陟南冈，乃覲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这是《公刘》的一段，一般认为该诗初成于周成王初即位时。该段意思是说：周先君公刘在观察了水源之后，还想再看看广袤的田园，于是他登上南面山冈上的高台瞭望，他看到那京师所

①《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第1149页。
②按：《汉书·沟洫志》载有西汉时的一首著名歌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把其时京师与“亿万之口”联系起来，极言其人多。
③《左传·僖公十一年》有云：“夏，扬、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王子带召之也。”由春秋时戎人先攻京师，再入王城的情形，知其时京师驻地与王城非一，但相邻近。

在原野上，到处在搭建军营，人声鼎沸。诗中的“庐旅”是说士兵在为自己搭建军营，并非如传统所解释的“寄旅”之意。《说文》：“旅，军之五百人为旅。”故旅亦可泛指军队。显然，这里的“京师”应是指公刘居豳时附近驻扎的大军。至于诗中“乃觐于京”之“京”，显为名词，与前述豳（镐）京之“京”一样是指土筑的高台。京作名词的类似用法，《诗经·大雅·大明》中也有“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意指挚任成为岐周人）、“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意指文王在岐周受天命）二处。这里的“京”与“周”并称，应当是指西周时期王都岐周用于举行重大典礼的“京室”，即太庙。例如，《诗经·大雅·思齐》所谓“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即可以作为挚任“曰嫔于京”的注脚。过去以“京”为京城解释应当错误。

（2）《虢簋》铭文中的“京师”：

唯六月初吉乙酉，（王）在京之师。戎伐□，虢率有司、师氏奔追，御戎于棫林，搏戎馘”。

《虢簋》为穆王时器。“京之师”，原文作，有学者释为“壺师”^①，而未知何意。其实原文首字乃“京之”合文，“京之师”即指京师。前已指出，先秦时代，双字名称之间可加“之”字，如“牧之野”即牧野、“寝之丘”即寝丘、“犬之丘”即犬丘，此“京之师”则又一类例。该铭文说的是虢为保卫周王，率军出击，在棫林地方与戎兵战斗。前文已经指出棫林即穆王新都郑之所在，因此，此之京师应即指驻于郑的王朝军队，“（王）在京之师”，意为周王在王师军营之中。

（3）《多友鼎》铭文中的“京师”：

唯十月，用玃狁方兴，广伐京师，告追于王。命武公：遣乃元士，羞追于京师。武公命多友率公车羞追于京师。癸未，戎伐筍，卒俘，多友西追。甲申之辰，搏于鬲，多友有折首、执讯。凡以公车折首二百又□又五人，执讯廿又三人，俘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卒复筍人俘。或搏于共，折首卅又六人，执讯二人，俘车十乘。从至，追搏于世，……复夺京师之俘。多友乃献俘臧讯于公，武公乃献于王。乃曰武公曰：汝既静京师，釐汝，赐汝土田。丁酉，武公在献宫，

乃命向父召多友，乃延于献宫。公亲曰多友曰：余肇使汝休不逆，有成事，多擒。汝静京师，赐汝圭瓚一、锡钟一肆、鐕簋百钧。

《多友鼎》为西周晚期厉王时器。这说的是多友率兵车抗击玃狁攻击“京师”事。文中六处提到“京师”，但只需从“复夺京师之俘”一句，就可以知道这里的“京师”是指周朝军队无疑，而不是王朝首都。所谓“复夺京师之俘”，意为多友又夺（救）回被玃狁俘虏的王师官兵。今本《竹书纪年》有云：“（厉王）十四年，玃狁侵宗周西鄙。”宗周西鄙，即指宗周丰邑以西的郊野，与《多友鼎》所记“多友西追”在方向上相合，当即其事。其时宗周附近应有“京师”驻扎。

（4）《克钟》铭文中的“京师”：

唯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康刺（厉）宫。王呼士智召克，王亲令：“克，遘泾，东至于京师。”赐克甸车马乘。

《克钟》是西周晚期器，具体作器时间必在厉王之后。由于“遘泾”是沿着泾水的意思，因而，“东至于京师”之“京师”，很有可能是指当时驻在戏邑附近的王朝军队。戏即周幽王的死地，位于泾水入渭水处东去不远，是渭水南面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城邑。（图4）西周时，确实在戏邑驻扎有王朝军队。如前引西周中期器《豆闭簋》有云：“唯王二月既生霸辰在戊寅，王格于师戏大室。”所谓“师戏大室”之“师”，即指周师、王师。

（5）清华简《系年》中的“京师”：

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②

这说的是西周、东周之交的政治斗争。这里的“京师”，《系年》整理者认为指宗周，另有学

①唐兰：《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

②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二章》。



图 4 西周关中地区的都邑分布

者则认为指晋都，皆不确，因为传世文献中有如下相关记载：

1、《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侯辞秦师而下。……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

2、《国语·晋语》：二年（前 769 年）春，（晋文）公以二军下次于阳樊，……左师迎王于郑。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郑。

3、今本《竹书纪年》：申侯、（魯）
〔曾〕侯^①、許男、鄭子立宜曰于申，虢公
翰立王子余臣于携。

4、古本《竹书纪年》：先是申侯、（魯）[曾]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

在前面郑国建国过程讨论的基础上，对比《系年》与上传世文献中加着重号的引文内容，可知二点，一是《系年》“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之“少鄂”，当指前述郑人寄籍的古申邑（西申、拾），东周以降多称郑。少、申二字上古双声（申，书母真部；少，书母宵部），音近，当为异记^②；“少鄂”之鄂，乃边界之意^③，非地名组成文字。这是说晋文侯来到申邑（国）边界一带迎接平王。古申邑即今陕西华县东北的拾村附近。（图4）拾村可谓是一个罕见的延续了近三千年而没有改变位置和名称的聚落。二是《系年》所谓“京师”即指驻扎在申地附近一带的王朝军队。据今本《竹书纪年》：幽王十年（前772年），“王师伐申”；清华简《系年》也说：“幽王起师，回（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

这样，申邑附近当时必定有王朝军队营地。因此，《系年》之“京师”也同样是指的王师、周师。

六 结 论

根据上面的讨论，笔者以为主要可以获得如下几方面结论。

其一，镐（京）即豳（京），最有力的证据是“辟雍”的存在。璧雍、密永、辟池皆为辟雍的异写，为辟（密、毕）地之大水池的意思。辟雍的大学含义是因辟雍干涸而在春秋之后产生的误识。灵沼、灵台、灵囿三者与辟雍有密切关系。程（邑）、永、崇（国）、毕程、毕郢、毕烝为一地异写，是位于辟雍湖滨的城邑。镐（蒿、鄙、豳、旁、溔）是商末新建于辟雍湖滨的城邑，拥有良好的渔猎、游赏条件，很受周王、贵族喜爱，承担了西周早期周王贵族居住、宴饮、娱乐、教育和部分政治、祭祀等方面功能。蒿、镐、鄙、豳、旁、溔等字存在的书写和读音

①按：原文作“鲁”，当是“曾”之形讹。这是因为西周春秋时期有“鲁公”而无“鲁侯”，鲁人也不曾参与两周之际换代立王事，而曾人与申人同是西周王朝的推翻者，一道参与扶立新王事理所当然。

②按：“少”，也有可能为“申”字之误。这是因为，申字古文作“𠂔”等，与少字形状较近，若文字漫漶，战国竹简的书写者完全有可能致误。

③“鄂”作边界、界限之义，同“𡵓”。《说文·土部》云：“垠，地垠𡵓也。”段玉裁注：“古者边界谓之垠、𡵓。”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十三篇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90页。

差异,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方音演变的结果。

其二,宗周为丰(邑),不是传统所称的镐京。金文、传世文献中有宗周与丰(邑)为一地的记载,且二者所表现出的重要政治、祭祀功能具有类同性。宗周(丰)是贯穿西周王朝的重要政治、祭祀、军事中心,设置有“三公”、“三司”等重要的政治、军事机构和大型祭祀、朝觐场所“酆宫”。丰(邑)的位置不在今考古工作者所发现发掘的陕西长安区沣西马王村、客省庄一带,而在今陕西户县东境的秦渡镇左近。

其三,郑(西郑)是周穆王建立的新都无疑。郑的都城功能类似于镐(京),是西周中后期周王贵族居住、渔猎、游赏的重要场所,具有一定的政治、军事意义。郑(西郑)即是棫林(槐里)、犬丘(军丘),其故城遗址在今陕西兴平东南。穆王常居的南郑,当今陕西汉中。西周末的前780年,郑(西郑)被幽王作为采邑赐予郑伯多父(郑桓公);西周灭亡前一年(前772年),郑(西郑)人东迁于拾(即申、西申,今陕西华县东北拾村一带)地寄籍;随着前770年周平王由申(拾、郑)迁洛(成周),周平王六年(前765年)郑人再东迁于今河南新郑一带。

其四,周即指岐周无疑。过去学者以周为镐京、宗周乃至成周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整个西周时期,岐周作为周王朝最为稳定的祭祀、政治、军事中心,拥有规模最大、名目最多的祭祀、政治、军事性设施,与镐京、宗周、成周等地的设施有显著不同。周的祭祀、政治性设施有“大庙”(或称周庙、周宫、大室、京室、京大室等),遗址很可能是陕西岐山县凤雏发现的甲组宫殿建筑基址;有“康宫”建筑群,遗址很可能是陕西扶风县召陈发现的西周建筑群基址。周的军事性建筑设施有“周师”宫室群,包括录宫、量宫、司徒宫、汙父宫、禹父宫等。

其五,《左传》所谓“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应是西周王都的判断标准。据此,西周时期符合该条件的王都只有周、宗周、成周、镐京、郑(西郑)五地^①(参见图4)。其中,周的政治、祭祀、军事功能最为完善,应是西周王朝的首都。传世文献中之所以没有明确提及周为王都,可能是因为当时国、都名号相同所致。宗周、成周分居关中、东土,拥有较强的政治、祭祀、军事功能,相当于西周王朝的行政性陪都。镐京、郑(西郑)的主要功能在于居住、渔猎、

游赏,政治、祭祀、军事功能有限,接近于游憩性陪都。

其六,西周时期的“京师”,指的是“周六师”、“成周八师”等周王朝军队,含义等同于“周师”、“王师”,不具有严格的地名意义,并不是西周时期的都城别称。西周之后,京师才逐渐演变出都城含义。

西周都城问题的上述新认识,较好地解决了西周都城研究中的主要谜题,改正了有关西周都城历史、地理传统认识中的某些错误,对于西周时期一些重要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深入,对于今天西周都城考古的推进和昆明池遗址公园(昆明池文化生态景区^②)的保护与建设工作,应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补 记

刚把本文的清样校稿交给编辑部,第二天即看见《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有这样一条报道:《陕西周原遗址发现九座大墓 确认发现西周晚期周城遗址》(2014年1月13日第548期),其中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周原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周原遗址进行了迄今最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此次调查总面积约50平方公里,调查断坎600条,记录遗存采集点近3000个,新发现了多处城墙遗存。通过航拍分析与勘察判断,首次确认在周原遗址发现了一座东西长约1510米,南北宽约640米,面积约90万平方米的西周晚期周城遗址。”这很大程度上为本文的主要观点之一提供了重要支持。

特补志于此。

作者 2013年1月14日

^①按:《师西簋》有云:“唯王元年正月,王在吴,格吴大庙。”此所谓“吴”,学者多指为“虞”之异写,即吴太伯之后周章弟虞仲所封的“周之北故夏虚”(《史记·吴太伯世家》),在今山西南部。笔者疑此吴或即周章所君之吴,当今江苏苏州。据今本《竹书纪年》,周穆王时曾“伐越,至于纡”,纡即吴之异写。不过,无论是虞还是吴,西周时既已封为诸侯,其“吴大庙”自然不具有中央王朝设施意义,固无由视吴为王朝都城。

^②《西咸新区沣东新城重现千年昆明池胜景》,《西安晚报》,2011年11月7日。

Keys to some puzzles on the capitals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Zhou Hongwei

(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orthwest China ,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 Xi'an, Shaanxi, 710062)

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capital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With the multiple points of view of history, environment and language, these problems can better be overcome. There were five cities, namely Zhou, Zongzhou, Chengzhou, Haojing, Zheng, which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standard of capital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Zhou or Qizhou(岐周), a capital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the most stable ritual,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enter, had the largest, most varieties' ritual, political and military facilities. Zongzhou or Feng(丰) which located at Qindu Town(秦渡镇), Huxian(户县) of Shaanxi, was a important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military center, with political auxiliary capital. Chengzhou or Luo(雒) which had strong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military functions, was a base of ruling the Eastern region, of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auxiliary capital. Haojing or Pangjing(辟雍), located by Piyong(辟雍) lake, with residing, eating, entertainment, education and political, sacrificial functions, was belonging to the auxiliary capital of leisure for the early Zhou. Zheng (West Zheng) or Huaili(槐里), a new capital established by Zhou Mu—wang(周穆王), was of important facilities of residing, fishing—hunting and enjoying and some political, religious, military functions, belonging to the auxiliary capital of leisure during the mid and late Western Zhou period, located at the Quangu Ruin(犬丘遗址) in southeast Xingping(兴平), Shaanxi. The so—called "Jing Shi"(京师), which was equal to "Zhou Shi"(周师, the army of Zhou Dynasty), "Wang Shi"(王师, the army of Zhou Kings), was not equal to capital. These new understandings can explain many mysteries, contradiction, ambiguities and errors for the capitals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will be of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advancing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capital archaeology of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and constructing the Kunming Pool Ruins Park.

Key words: Western Zhou Dynasty, Haojing(镐京), Zongzhou(宗周), Zhou(周), Chengzhou(成周)